

國立台灣大學理學院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越界台茶與拼配的本土

Cross-border Taiwanese tea in Vietnam and
the Blending of Localness in Taiwan

練聿修

Yu-Hsiu Lien

指導教授：洪伯邑 博士

Advisor: Po-Yi Hung, Ph. D.

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February, 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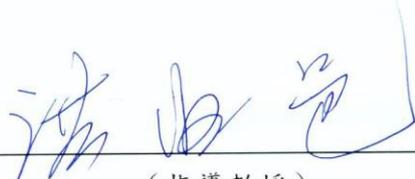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越界台茶與拼配的本土
 Cross-border Taiwanese Tea in Vietnam and
 the Blending of Localness in Taiwan

本論文係練聿修君 (R04228009) 在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所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7 年 01 月 11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簽名)
 (指導教授)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謝誌



大約是三年前的這個時候，我亂入了洪伯邑老師的導生聚，誤打誤撞的牽上了越南的線；再過半年，就在交出學士論文的隔天，連畢業證書都還沒拿到（實際上，後來差點沒拿到），就搭上前往越南的飛機了。直到在候機室，被完全陌生的語言包圍時，我才意識到從 *undergraduate* 到 *graduate* 的身分巨變，以及，我已經走上一條從來沒有想過的路。在這之前，我對學術一無所知，只會張牙舞爪的拋出一知半解的理論詞彙。在這之前，我從沒經歷過田野，更別說遠去越南，身處在人、茶、空間與關係中。在這之前，我無法想像，我竟會為了一群人深鎖的眉頭或喋喋不休而揪心不已，甚至在幾個細讀田野資料的深夜酸了鼻頭。在這之前，我從沒想過，我也能做一個記錄故事、說故事的人。

在這條路上，手把手教會我念書做研究，一步步指導我前進的，是洪伯邑老師。一開始還會畢恭畢敬，甚至先去打聽「在洪老師面前有甚麼要特別注意的嗎？」，過了三年半後早就已經面目全非。說實話，每次打開以前的論文、研究計畫或任何進度，都會替過去的我感到面紅耳赤；而老師竟然還要故做鎮定地給出建議，我在感受自己的進步與老師的苦心之餘，忍不住想問老師——你都不會想笑嗎？感謝的話語，此處再怎麼窮盡筆法，可能也比不過在河內與台東的酒後吐真言。得求一個能夠裸裎以對（字面上的意思…）的好老師，是我最大的幸運。希望老師退休的時候，我們（還有冠仁！）還能坐在一起喝酒亂講話，然後再替現在的我感到面紅耳赤。

雖然我很早就打定主意以邊界作為核心關懷，但是在和徐進鈺老師接觸之前，我對政治地理學始終缺乏系統性的理解。我始終記得，徐老師在計畫書口試的時候，劈頭就問：「你做這本論文的初衷是什麼？」一棒讓我意識到，我為何會替千里之外的台灣茶人感到糾結。我也要感謝楊昊老師，因為在此之前，我同樣對東南亞研究一無所知，在台商研究、在南向政策的領域，還有太多我必須要和楊

老師請教的地方。除了兩位參與我兩次口試的老師以外，我還要特別感謝簡好儒老師，在《論文研究寫作》的課堂上，也經歷過看我論文看到內傷的痛苦，在我尋找寫作感覺的那個月，恐怕都有好儒老師和評閱同學的血淚。

408 研究室，最夢幻的工作與學習環境，沒有之一。一間研究室，在工作與提供熱量之餘，竟然還兼具了休息和娛樂的功能，對比我接下來要去的地方，真是名符其實的天堂。感謝慧岑、純鎰、偉倫、季庭、寶慧、莉靜、思好等學長姐留下來的良好氣氛與研究遺產，還有育安、宇忻、冠仁、思安、于萱一起經歷的海內外花式忤逆與作死，在研究室鳩佔鵲巢、打桌球、打籃球、打棒球、燒艾草灰、騷擾與被騷擾、喝醉（慧岑跟純鎰！）、跳舞龍舞獅、唱歌劇（郭育安！）、玩桌遊、打麻將、拆厝、火燒厝、逛 IKEA 換裝璜、看其他人被雷的外焦內嫩、一起出國開會、和冠仁屁股擠屁股的在越南做田野、熬夜趕工後四個人擠在地毯上睡覺……三年半來幹了太多不該發生在研究室裡面的事情，祝福未來還要暫佇此處的人們，宇忻能繼續捍衛 408 優異的勞雇關係，育安、冠仁、思安寫作一切順利，于萱、芭芭拉、東霖和我還沒見過的明堂田野平安。最後，希望我入伍前，還能跟 408ers 再打一次麻將！

除了在研究路上與我緊密相連的諸多師長同學，真正成就這本論文的，是那些在越南、在台灣、在茶山上、在網路上的各位老闆、老闆娘、阿伯、阿姨、大哥、大姊。越南台茶實在太多爭議，每個願意接受訪問交流的茶人，或許都冒著身家事業的風險，對此我再多的感謝都顯得蒼白。為了保護受訪者，沒辦法如老師、同學那般一一實名致意，是我最大的遺憾。我必須要特別感謝阿伯、阿姨、阿湧一家人的照顧，沒有你們我大概連林同都去不了，更不用說在茶廠裡前後蹭了兩個月的飯；也要感謝小寬姐，明明無論茶或論文都不是你的本行，但這兩年半間卻幫我聯絡了太多事情。還有太多太多人曾經接受訪問，提供資料，甚至帶領我見識台灣茶最玄妙的竅門。你們的幫助，不只讓我對茶有了那點一知半解，不只讓我寫成這本論文；我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你們的幫助，讓我更了解我

自己。對此，一個碩士班學生能做的不多，除了這本不會有太多人看的論文之外，我也在聯合線上、天下獨評投稿，還有在地理野台、東研青、燦爛時光的經驗分享（也要感謝上述單位），做一個記錄故事、講故事的人該做的事，聊表謝意。

雖然我在研究所的兩年半越來越孤僻，但此時還在身邊的，無一不是研究路上必須感謝的人。我有點詫異地發現，必須寫在第一位的是原本沒有太多交集，後來變成我的前經紀人的亭瑜。在蘇編找上我之前，雖然一直都想投越南台茶的稿，但始終沒有實際行動；而且和你的合作，讓我對越南台茶的議題、還有自己的文筆找回不少信心——雖然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所以我同樣也要感謝萬宗綸在多年前架了地理眼給大家練筆，請繼續扮演好教主的角色，讓我跟著你的腳步前進。好像謝完這兩位，就該輪到偷你了，我們的交集好像已經過多，撞梗撞到都不尷尬了。偷你，再加上冠仁和鴻揚的另一個對話串，內容實在糟糕到不值得提起，但是從四老到四殘再到四殘†的一年球齡，從吃鍋貼到被打哭再到選球盃冠軍，確實值得我們懷念一下。短得可憐的朋友名單最後，是在論文路上幫我許多的朋友們：一起跟著老師上山下海，有吃香喝辣也有抱頭鼠竄的冠仁；我輩楷模純鎰，你的論文我最近每天抱著當聖經；寫作團體無疾而終，但後來在荷蘭款待我們一個禮拜的巧嫫，祝你早日畢業買房；在專討二最後階段，提供我寶貴建議、修改方向和結論寫法的凌毅；三次海外研討會的旅伴們；最後的酒肉朋友凱軒，希望下次見面我們的酒量不要再繼續探底了；把我拖入所學會的坑的慈忻，陪我度過這個坑的飛鷹，被我拖下來填坑的善榆；我發現我也必須感謝開洋，沒有你我應該會因為牙痛痛死在火車上。

在研究所的兩年半，我時不時為了念書趕進度而作息大亂，老爸老媽，你們也辛苦了。這兩年半最大的收穫之一，就是每個禮拜六都會留下來和媽媽吃晚餐，偶爾隔天早上一起去菜市場，反而比大學的時候更常一起說話。然後，我還是覺得你應該找個輕鬆點的單位，別再每個禮拜加班了。至於老爸，放輕鬆，別緊張，然後也不要製造我的緊張……

最後，還有那些已經離去的人。你們的愛和支持和期許，曾經是我一路走來，能夠面對一切挑戰的信心來源。也許我真的走太急、走太快、一心只想著前路，驀然回首，才發現已經來不及說聲謝謝和抱歉。也許永遠留於飄渺之間，但我還是要說，祝你一切都好。

這本論文得以實現，也有賴洪伯邑老師的整個研究團隊、台大與科技部的支持，分別是《台茶南向：越南茶、台灣農技轉移與跨境茶鄉地景的政治生態學》、《跨境移動下的自然：台越農技轉移與邊境治理的政治生態學》、《南向的茶：越南茶與台灣農技跨境轉移的領域政治》三個研究計劃，以及科技部補助下參與《2017 國際地理聯合會主題會議：和平地理學》（案號：106-2922-I-002-139）。一路走來，得之於人者太多，希望這本論文，旨於學術者，能夠從中得到一些整理與靈感，心繫茶葉者，也能讀著故事，和我走一遭越界台茶。如此，或許就能無愧於這麼多必須感謝的人了。

摘要



邊界一詞在近年重新受到重視。冷戰結束後的一段時間裡，受到歷史終結或地理終結論調，以及關係性觀點的影響，無邊界的全球空間想像一度占據主流。但是在當代的地理現象中，邊界如何選擇性且有效率的讓移動與排除並存，以及非國家行動者的角色，成為新的政治地理核心議題。而在農業的討論中，跨境農業貿易與在地取向之間的衝突，也讓邊界運作更加複雜。立基在台灣與越南之間的茶葉貿易，本文試圖探討農業保護主義與跨境貿易之間的邊界運作過程。在本土化轉型過程中，台灣茶被賦予健康、高品質與本土的形象；而轉型後的產量減少，也促進了台灣茶產業轉移至越南。當台灣消費者逐漸將本土生產視為台灣茶的本質之一，經常與本土茶拼配或混用的越南茶因此被批評為「毒茶」、「爛茶」與「混茶」。這些負面形象也成為了排除越南茶的象徵性邊界。因此，本土化台茶與進口茶的爭議不僅重新定義何謂本土，更促動本土台茶的邊界化過程。本文透過越南茶負面形象，與茶葉生產中攸關邊界穿越的物質性日常實做，分析台茶本土化如何做為一個邊界化過程。本文認為，越南台茶負面形象的爭議，實際上是不同經營者透過生產過程的實做，在遠離邊界地帶的物質性每日實做，介入邊界運作的具體展現。台灣茶產業與越南茶的案例，揭示了農業保護脈絡下的本土，並不是單純的對跨境農產品的拒斥，而是透過空間與象徵性邊界共構出的分類與排除。

關鍵字：台灣茶產業、越南、空間性邊界、象徵性邊界、物質性

Abstract

Border has become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again. Influenced by sayings of the end geography and the relational approaches to geographical research, the global spatial imagination of a borderless world once became the mainstream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owever, a borderless world has never been realized. Still, how borders sel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open or enclose, and what the role of non-state actors play, are emerging issues in geography, especially of political geographies. Nonetheless, borders have never been an issue only related to boundaries between nation-states. Rather, political geographers have relocated border studies to everyday lives to re-conceptual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rder work and non-state actors, including those in geographies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As such, the dispute between global agro-food system and local food movement makes borders even complicated. Based on the tea trade between Taiwan and Vietnam,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bordering process between agro-protectionism and cross-border trading. Taiwanese tea has been constructed as the symbol of healthy, high quality, and localness since the localization of tea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he localization of tea also leads to the decreasing of production, which has entailed the transference of Taiwanese tea industry to Vietnam. While consumers gradually take local production as the nature of Taiwanese tea, Vietnamese tea, which is often blended with Taiwanese tea, therefore has been criticized as poisonous, bad, and in-authentically mixed tea. These negative images become the spatial and symbolic borders against Vietnamese tea. Accordingly, the dispute of Vietnamese tea not only redefines the localness, but also enacts the bordering process of Taiwanese tea. This thesis analyses how the localization of Taiwanese tea becomes a bordering process. Data are based on field works focusing on negative images of Vietnamese tea and the material everyday practices of border crossing between Vietnam and Taiwan. I argue that the dispute of negative images of Vietnamese tea reflects the bordering process through people's everyday practices of tea producing, and the materiality of tea plays the key role in mediating different forms of borders. The empirical studies of Taiwanese and Vietnamese tea offer the lens to re-consider the agro-protectionist localness. It is not only a refusal regarding cross-border agro-products, but also a mechanism for categorizing and excluding Vietnamese tea from Taiwanese tea through the co-operating of spatial and symbolic borders.

Key words: Taiwanese tea, Vietnamese tea, spatial border, symbolic border, material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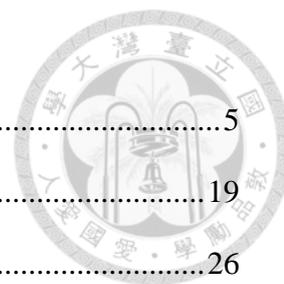
目錄	
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	i
謝誌.....	iii
摘要.....	vii
Abstract	viii
目錄.....	ix
圖目錄.....	xi
第一章 前言	1
1.1 前言.....	1
1.2 章節架構.....	3
第二章 文獻回顧	5
2.1 台灣茶產業脈絡下的越南台茶.....	7
2.1.1 越南茶產業概論.....	7
2.1.2 台灣茶產業轉型脈絡下的越南台茶.....	8
2.1.3 台灣學術觀點下的越南台茶.....	10
2.2 邊界.....	11
2.2.1 邊界的經驗現象與抽象概念.....	12
2.2.2 邊界化過程：空間—領域策略.....	1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18
3.1 田野工作.....	18
3.2 研究方法.....	20
3.3 研究限制.....	23
第四章 毒茶：農藥使用、食品安全與劃界	25
4.1 爛茶的負面形象與農藥矛盾.....	27
4.2 管制風險、市場價值與品種特性.....	32

4.3 管制風險與越南台茶農藥管理.....	37
小結.....	41
第五章 爛茶：物質性、每日實做與邊界運作	43
5.1 「爛茶」的負面形象.....	45
5.2 大規模生產.....	50
5.3 添入物質性的日常實做.....	56
小結.....	61
第六章 混茶：多重邊界的疊合	63
6.1 「混茶」的負面形象.....	65
6.2 拼配與純粹.....	67
6.3 空間與象徵性邊界.....	72
小結.....	77
第七章 結論	79
參考文獻.....	84



圖目錄

圖 1 三項越南茶 2003~2016 年海關資料	5
圖 2 越南林同省田野地點地圖.....	19
圖 3 台商咖啡園和越南農民家戶農場交界處.....	26
圖 4 咖啡木蠹蛾.....	33
圖 5 遭到蟲害的金萱.....	35
圖 6 疑似遭到蛀心蟲蛀蝕的茶樹枝幹.....	35
圖 7 2015 年的茶園一角.....	36
圖 8 2016 年的茶園一角.....	36
圖 9 2017 年的茶園一角.....	37
圖 10 準備提供予越南契作茶農的農藥使用規範表格.....	41
圖 11 新聞中的台灣茶與越南茶比較。.....	45
圖 12 蓮花機.....	53
圖 13 豆腐機.....	53
圖 14 茶丸.....	54
圖 15 越南工頭，以及他所負責的三台浪菁機.....	59
圖 16 搬運茶袋、並起將茶菁送入機器中的茶工.....	60
圖 17 越南最早的台灣烏龍茶種試驗田.....	82



第一章 前言

1.1 前言

胡志明市安東市場旁的某間旅館，在我這兩年半的碩班生涯，以及這本論文中，佔有短暫卻重要的時光。因為櫃台會說中文，而且鄰近前往調查地點的巴士公司，這間旅館成為我每次調查前後一定會待上至少一晚的地方；而前後歷次總計約一個禮拜的零碎佇留，也是我調整成工作狀態，以及總結移地研究成果的時間與空間。2015 年七月，結束第一次移地研究之後，我身心俱疲的癱倒在床上，揉著太陽穴，苦思該如何總結龐雜的資料；以及在我們各自回房安頓前，同行的洪伯邑老師拋出的問題：「練聿修，你對你自己的論文，有什麼想法？」

我先試著從整理「他們」的觀點開始。在我們的第一次移地研究前後，乃至接下來到這本論文完成的兩年半間，越南台茶正在面對二十多年來最嚴峻的危機。2015 年 4 月，台灣數家知名飲料茶業者¹原料接連被驗出農藥殘留超標，引起一系列衝擊整體台灣茶產葉的食安風暴。這不是台灣茶葉農藥殘留超標之首例，媒體報導、輿論很快地和過去幾次越南茶²相關新聞進行連結(程遠述等, 2015/04/23; ETtoday 新聞雲, 2015/04/23、2015/04/24)。在相關單位追查之下，這批農藥殘留超標的茶葉來自台灣中部的中低海拔茶區的茶廠，但原料茶菁的來源從此眾說紛紜，一說為台灣中部的國內茶，一說為混用進口的越南茶。同年 8 月，台灣政府提出強化產地標示、邊境管理等對策(魯永明, 2015/08/01)，將矛頭直指越南茶，試圖透過海關辨明越南台茶並排除在外，重新穩定國內茶市。2015 年的事件，是台灣近二十餘年來，關於越南茶負面形象最具代表性、但絕非唯一的爭議。

¹ 林鼎盛(2007)、蘇怡如(2011)的定義中，飲料茶包含罐裝飲料茶、茶館和泡沫紅茶式茶舖。一般而言，台灣飲料茶產業的起源是 1985 年上市的開喜烏龍茶，首創冷泡茶和加糖茶飲料；隨後茶飲料在 1990 年代超越碳酸飲料，成為台灣飲料市場主流。而根據經濟部統計處的數據，目前所謂的「茶類飲料」類別下包含了烏龍茶、綠茶、紅茶、奶茶、果茶、花茶、其他茶類飲料的項目。

² 越南茶產業主要分布在北部丘陵和南部林同省一帶，主要為紅、綠茶，並有少數調味花茶；出口到台灣的部分則以紅茶、綠茶和烏龍茶(半發酵茶)為主，其中本研究主要討論的是烏龍茶，其資金、茶種、技術、機器都是自台灣移植，生產基地集中在林同省一帶。

越南的茶葉生產集中在北部山區與中部高原，以紅、綠茶為主，另外還有少數調味茶和烏龍（部分發酵）茶；進口到台灣的部分，則以紅、綠、烏龍茶為主。其中，位在越南中部的林同省烏龍茶區和台灣有著密切的連結，也是本文聚焦之所在。從 1980 年代開始，陸續有近三十家台資茶廠將烏龍茶的品種、技術、機器和資金轉移到此，並且出口到台灣，形成越南烏龍茶最主要的產區。時至今日，茶葉及其相關產業也逐漸擴散到越南經營者手中，以及越南的內銷市場；近年對越南茶負面形象的報導、論述與政策施為，也加速了林同省台灣經營者的衰退。

越南茶負面形象的爭議，反映的是農業保護主義與跨境農業貿易這組當代台灣農業的核心辯論（江昺崙，2016/04/19）。在各種程度的在地取向農產品供需體系日益受到重視與推廣的同時，跨境農業貿易活動實際上從未減少，甚至供應了大多數人日常所需的熱量與消費來源。當代的台灣茶產業即是這個脈絡下的典型案例。1980 年代，台灣茶產業改變了一百多年來原料出口的生產體系，轉向高價內銷與飲料茶產業。產量較大的中低海拔原料茶區消退，取而代之的是產量較低、單價較高的高山茶區，以及追求海拔與山頭的議價模式（邱念渠，2005；吳淑娟，2007；陳宇翔，2007）。在這個轉型過程中，台灣茶同時也被建構為健康、高級、本土認同的象徵。然而，在這個所謂的「本土」形象豎立的同時，產量減少意味著這個本土實際上是建立在大量、甚至是過半的跨境農業貿易之上。越界而來的越南台茶，不只在數量上填補台灣所需，甚至也參與了物質性的安全與品質的形構。國內產量的不足促進了前述遠赴越南的產業轉移，大量難以區辨的越南茶跨境而來，農業本土性的危機浮現，激起了國內茶農對於重劃邊界（border）的焦慮。

邊界一詞在近年重新受到重視。冷戰結束後的一段時間裡，歷史終結或地理終結的論調，以及關係性觀點，無邊界（Borderless）的全球空間想像一度占據主流（David Newman, 2006）。但是當代的地理現象，例如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反/恐怖主義，邊界如何選擇性且有效率的讓移動與排除並存，以及非國家行動者的

角色，成為新的政治地理核心議題。Reece Jones (2009a) 以分類 (category) 的觀點重新理解邊界與邊界研究，對本文及越南茶的議題卓具啟發。Jones 認為，在理解國家邊界的同時，我們不能忽視分類的建立、分化與劃界如何在更廣大的、遠離國家邊界的社會範圍涉入邊界的運作。當前的邊界研究不再只是關注分類的建立、分化與劃界，更要分析這些分類如何被國家與非國家行動者參與及理解。

台灣茶產業的本土化轉型，以及越南茶負面形象的爭議，實際上就是一個攸關何謂台灣本土的邊界化過程。國內與越南的茶農、茶商透過茶業生產過程的每日實做，在遠離邊界之處以非國家行動者的身分涉入邊界運作。本文聚焦在越南茶負面形象，以及相關的跨境茶業生產每日實做，探究農業生產過程中的非國家行動者每日實做如何涉入國家與象徵性邊界的運作，形構當代的台灣農(茶)業本土。由此，本文將依據下列三個資料蒐集方向進行研究：

1. 台灣與越南的茶葉經營者如何講述、回應與挪用越南台茶發展歷史及負面形象，藉以定義其心目中「台灣茶產業」的範圍？
2. 台灣與越南的茶產業經營者如何在食安、產業發展的爭論中，重新定位自身在產業中的位置與發展方向？
3. 台灣與越南的茶產業經營者如何透過經營策略調整的實踐，藉由茶與茶葉生產的差異涉入國家與象徵性邊界的運作？

1.2 章節架構

上述三個提問，不只是本文的資料蒐集方向，同時也是本文的書寫架構。接下來，在第二章，本文將先界定研究對象，並且針對越南台茶的經驗現象，以及邊界的概念進行文獻回顧，提出分析所需的框架。第三章為研究方法，本文將簡介研究地點與移地研究內容，而後逐一說明上述三個提問的資料蒐集方式，並且分析本文的研究限制、以及這些研究限制如何作為本文分析的重要環節。

在正文的四、五、六章，本文將逐一討論越南台茶的三種負面形象：毒茶、



爛茶與混茶，從茶葉產銷種茶、製茶到賣茶的三個階段，探究其分別對應的邊界運作情形。在第四章，本文將先討論最廣為流傳的毒茶負面形象，並且援引政治生態學對農藥使用的討論，分析品種特性與管制風險如何影響食品安全的邊界運作。在空間性邊界的層次上，海關執行的農藥殘留檢驗，一直都是台灣政府標記、拒斥越南茶最主要的手段。在象徵性邊界的層次上，農藥、甚至是落葉劑殘留的指控，是國內茶業經營者對越南台茶最普遍的指控，也是盤商討價還價時的首要條件。面對食品安全的邊界運作，越南台茶經營者透過茶葉品種的物質性，與大規模原料生產的勞動力體系，發展出一套獨特的農藥管理模式，確保其產品不會被排除在「安全」的空間與象徵性邊界之外。

在第五章，本文將會聚焦在品質的爭議，分析當前台灣茶產業內部關於品質的分歧，如何依循邊界運作的路徑向越南層層轉移，促使越南台茶經營者在物質性與日常實踐之間，建立專屬於越南台茶的品質管理實踐。「爛茶」的負面形象，源自越南台茶的大規模原料生產經營模式。但實際上，透過與物質性、勞動力體系和每日實做的磨合，越南台茶經營者們一方面將台灣茶產業難以捉摸的品質標準，轉移到與越南茶工之間的張力；另一方面，越南台茶經營者也由此提取出一套適合大規模原料生產的品質管理模式，確保越南台茶能夠緊追台灣茶產業捉摸不定的品質標準，從而參與品質的空間與象徵性邊界運作。

在第六章，本文將討論混茶的負面形象，透過「拼配」這門爭議性的關鍵技術，探究台灣茶產業在全球農食體系與在地取向之間的拉扯，並且呈現越南台茶經營者們如何面對最新的邊界運作情形。為了解決全球農食體系與在地取向之間的路線辯論，越南台茶的反對者在 2015 年飲料茶農藥殘留超標事件之後，試圖藉由新的邊界化過程，封閉邊界，排除越南台茶。在此，緊密連結的空間與象徵性邊界，延伸到每個可能遭遇越南台茶之處，是貫穿整個社會，發生於日常生活中的邊界化過程。

第二章 文獻回顧

在接下來的文獻回顧，本文將依序呈現、討論三個部份：研究對象界定、台灣茶產業脈絡下的越南台茶、邊界與概念框架。在進入正文之前，本文必須先交代不同研究對象群體的指涉對象與明確範圍。在經驗現象部份的文獻回顧，將會以台灣茶產業脈絡下的越南台茶為主軸，回顧越南與台灣觀點下的越南台茶發展脈絡。在概念框架的部份，本文以地理學中關於邊界的討論為核心，將當前邊界的討論拆解為空間與象徵性邊界，分析越南台茶如何引導不同行動者涉入不同形式的邊界運作。

在進入越南台茶相關研究的回顧之前，本文首先要定義研究對象與行動者。越南的茶葉生產分布在北部丘陵和中南部的林同省，主要是紅（全發酵）、綠（未發酵）茶和少數的調味花茶。出口到台灣的部分，則是以紅、綠茶，還有烏龍茶為主（見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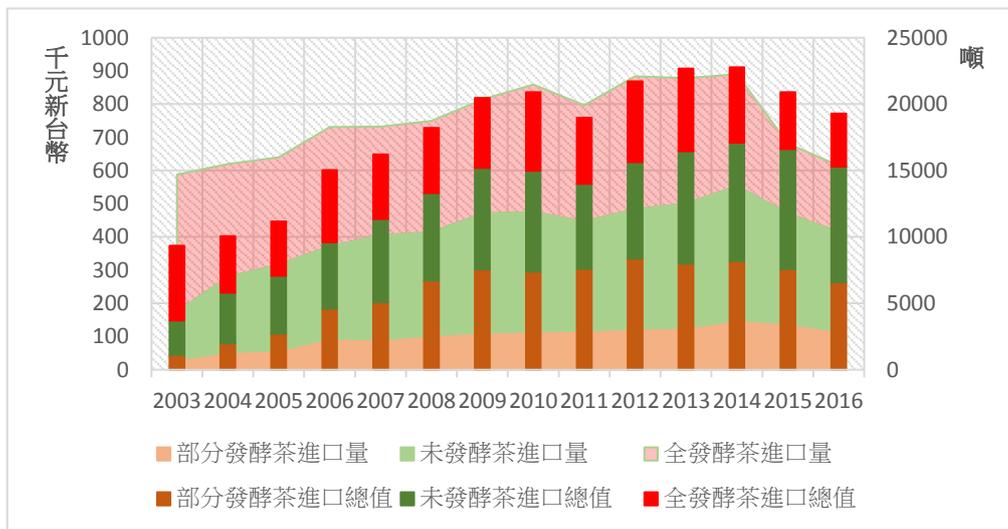


圖 1 三項越南茶 2003~2016 年海關資料（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圖中的紅色、綠色與咖啡色分別代表全發酵茶、綠發酵茶與部分發酵茶之資料；長條圖為不同茶種的進口總價值（單位為千元新台幣），區域圖則為不同茶種的進口量（單位為噸）。

在這之中，為了聚焦、深入台、越之間的空間與象徵邊界的運作，本文會聚

焦在林同省烏龍茶生產，以及其中的台灣經營者。如前所述，不同於越南的紅綠茶生產，林同省烏龍茶和台灣關係極為密切，資金、茶種、技術、機器都是來自台灣。同時，林同省烏龍茶和台灣的交流與互動也從未中斷，從草創之初的投資，延續到現在的技術流動與進出口貿易。而這一系列技術流動與進出口貿易，反映的不只是越南林同一地的農業地景變遷，更與晚近台灣茶產業及農業政策緊密相連。正是在這個過程之中，台越之間的烏龍茶生產與貿易，彰顯了本文關注的邊界議題。換言之，本文的關懷不只在於越南茶產業或台商研究，更要試圖探究台灣茶產業、農業政策及不同行動者如何透過定義安全、品質與空間，涉入邊界開放或封閉的運作之中。

為了確保行文簡潔明確，本文在此將對後文中諸多研究對象進行定義：

台灣茶產業：指稱所有以台灣為技術、品質和市場為標準的茶業種植、製作、貿易和形象建構活動，包含過去各種茶類的原料出口，以及當代跨國的高價烏龍茶和(相對)低價飲料茶產業。關於本文如何理解跨國的台灣茶產業，詳見 2.1.2。

越南台茶：指稱投入越南台式烏龍茶生產。越南的烏龍茶生產，截至目前為止仍集中在二十餘家林同省台商手中，僅有極少數北遷至北越，或是林同當地種植台灣茶種、提供茶菁予台灣經營者為生計的越南茶農。總體而言，越南台茶仍然以林同省的台灣經營者為大宗、主流，其歷史、動態與歧異也是本文主要的資料來源。相較之下，本文中若出現**越南茶**一詞，則是泛指紅、綠、烏龍等各種茶類的越南茶產業總稱。

經營者：指稱所有參與茶產業的茶農、茶師、茶商。以越南台茶為例，其中的經營者多半必須一手掌握種植、製作、出口等流程³，難以界定為茶農、茶師或

³ 實際上是「透過越南茶工」一手掌握種植、製作、出口等流程。不過截至目前為止，本文尚未發現越南茶工、或是監工能夠主導其中任何一個環節。我們不能排除這個觀察是否是因為語言與身分上的研究限制，導致本文無法深入了解越南茶工在其中的位置；因此，本文將在第五章以勞動力編制的觀點，理解越南茶工如何作為邊界運作的一部份，以及台灣經營者與越南茶工間的關係/張力。

茶商等單一身分。因此，本文以經營者一詞指稱茶農、茶師與茶商的交/聯集，例如以**越南台茶經營者**指稱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以台灣人為主的林同省台式烏龍茶茶農、茶師與茶商的交/聯集，**國內茶業經營者**亦同。



空間邊界：指稱通常由國家行動者主導，以主權國家領域為單位的邊界運作。國家行動者在本文中通常是做為海關或農業政策制定者，透過海關檢驗標準和產地標示的制定與實行介入邊界運作。但空間邊界並非國家行動者的一言堂，許多本土茶業經營者、研究者或非營利組織，都曾透過推動原產地標示等政策，試圖封閉空間邊界。

象徵邊界：指稱各種從分類、差異與劃界的過程，也就是貫穿本文的越南茶負面形象。通常由本土茶業經營者支持象徵邊界的封閉，而越南台茶經營者則透過生產及進出口貿易穿越之。

2.1 台灣茶產業脈絡下的越南台茶

在第二章第一節，我們首先將回顧理解越南台茶所需的經驗現象。本節以台、越等地關於茶產業的學術論文為主，回顧林同省作為經濟作物生產基地的歷史淵源，並探究 1980 年代台灣茶產業的本土化轉型，如何一方面催生出對越南台茶的需求，一方面也將其視為亟欲排除的重大威脅。

2.1.1 越南茶產業概論

針對越南茶產業的研究中，Do Van Ngoc (2012) 回顧了越南茶產業發展概況與歷史。越南茶主要產區在北部山地 (70.4%) 和林同省所在的中部丘陵 (20.6%)，最早是由法國人在 1890 年代引進相關種植、加工和研究技術，並且在中部高原推廣，而林同省寶路也在 1931 年成立茶產業研究站。1990 年代以後，因為既有市場 (前蘇聯、東歐) 崩潰，越南茶產業面臨轉型，引進其他國家技術、資金，其中就有提到台灣人在林同省的烏龍茶產業，特別是金萱種，在資金、技

術上占有極大優勢；這些茶主要出口到台灣，但是越南國內市場也在逐漸擴大，並且是越南國內單價最高的茶種。

針對越南茶產業的相關研究主要分成兩個部分，一則是市場分析的面向，包括 Yoshiko Saigenji 與 Manfred Zeller(2009)在北部茶區製作型態的研究，或 Tuan M. Ha(2014)對中部高原太原省有機茶市場網絡的研究。另外則是從農業政策、發展的角度進行分析，Steve Déry(2000)將林同省的農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包括前殖民、法國殖民時期、戰後與共產黨統治階段，視為一個透過殖民化政策整合邊緣地區與人民的過程，特別是京族、法國殖民者或兩者的結合，如何透過農業發展逐漸控制林同省，並且將少數民族邊緣化。但是他研究中，沒有深入處理土地使用、作物與族群的關係，也沒有處理到 1980 年代以後日本、台灣經營者引入的資金、技術與截然不同的經營型態。Duc Phuoc 等人(2001)分析了越戰之後越南中部高原的農業變遷概況，其中林同省的部分僅提到了寶路市一帶的國營桑葚農場，以及桑葚價格滑落之後興起的咖啡、茶經營，尤其是在 1994 到 1999 年間，林同省茶葉種植面積增加了四倍。但是在這些研究中，除了 Do Van Ngoc(2012)在越南茶產業整體版圖的描繪中提到了台灣烏龍茶經營者的資金、技術和品種，Déry(2000)的殖民分析和 Phuoc 等人(2001)近四十年的產業變遷都沒有處理到台灣經營者的部分；這部分可能和 2000 年以前越南政府不開放外資，台灣經營者必須透過越籍合作者「掛人頭」的政策而隱身不見有關。然而，如同 Ngoc(2012)提到的，台灣烏龍茶經營者的資金、技術和品種除了出口台灣之外，內銷市場也正在擴大，甚至成為越南政府試圖推廣的茶產業面向，越南、特別是林同省的台灣烏龍茶值得更深入的檢視。

2.1.2 台灣茶產業轉型脈絡下的越南台茶

關於台灣茶產業的歷史回顧，目前有一個較普遍的說法，就是從十九世紀開始不同茶種的原料出口，在 1980's 以後逐漸本土化轉型為精緻內銷與飲料茶產



業。台灣茶產業自 19 世紀後期開始，即以北台灣淺山、丘陵地帶為主要產地，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烏龍與包種原料茶出口產業體系，包括種植、粗製、精緻、分級包裝出口與資金周轉（林滿紅，1997；台灣總督府著、徐英祥譯，2011）。台灣茶產業的原料出口體系，儘管數次遭遇政權交替與全球茶市變遷，甚至數次大規模轉營其他茶種，但整體框架一直維繫到戰後的綠茶出口。1970 年代以後，隨著國際綠茶茶市競爭日趨激烈，以及兩次石油危機後大幅提升的出口成本，台灣茶產業開始著手開發內銷、尤其是高單價市場。

台灣茶產業轉型的核心，在於試圖建構國內種植、國內製作、國內市場的本土化形象；而具體的作為與現象主要包含三點：茶比賽、法規調整與茶區轉移。1975 年，台灣首次舉辦茶比賽，目的在於針對國內消費者建構台灣烏龍茶作為健康、精緻，以及中華精緻飲食文化與國內技術創新的結合（陳宇翔，2007）。再者即是 1982 年廢除了茶廠管理條例，在將生產技術與工具開放予新興的自產自銷茶農時，也讓原料出口體系中十分重要的大規模茶廠陸續歇業，加速原料出口體系瓦解（邱念渠，2007）。最後，隨著北台灣淺山、丘陵地帶逐漸都市化、工業化，新興的內銷茶產業轉向霧社、廬山等海拔 1400 公尺以上的山區發展。更高的生產成本和更低的產量，促使台灣茶產業不只是本土化、更是高單價的本土化。

但是，在台灣茶產業本土化轉型，既有原料生產消失的同時，對於低單價原料茶的需求並沒有消失，甚至持續增加，並且逐漸開始依賴進口茶補充。一方面，國內的茶葉產量無法滿足本土化台茶經營者的野心，各高山茶區的產量遠少於台灣沖泡茶市場的需求。尤其隨著中國觀光客經濟蓬勃發展，相對中、低價位的沖泡茶產品需求大增，成為越南台茶重要的銷售途徑⁴。另一方面，本土化台茶也催

⁴ 此處的茶葉原料混用情形遊走台灣法規邊緣，無法取得直接的數據資料，主要資料來源為台灣製茶龍頭組織、台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陳振鐸先生於訪談中的說法。陳先生作為製茶公會理事長，其對於台灣茶產業輪廓的描繪，應具有相當的可信度。關於茶葉原料混用與越南台茶的關係，詳見第六章。



生了新興瓶裝茶、飲料茶產業，這些對低價原料茶需求更大的新部門，甚至已經成為新的台灣本土象徵，引領台灣茶產業重回國際茶市。換言之，被視為健康、精緻、本土象徵的台灣茶，無論是高價位沖泡茶或是中低價位瓶裝、飲料茶，實際上都是高度依賴於越南台茶、甚至是其他茶種的支撐。2015 年，台灣國內茶產量一萬四千餘噸，總進口量三萬一千餘噸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2016)，其中越南就高達一萬七千餘噸——這已經是在 2015 年飲料茶食安事件影響下，越南茶葉進口量大減之後的數據。在此，本文試圖替台灣茶產業本土化轉型經驗現象上的理解再行補充：正是 1980 年代以來的本土化轉型，刺激了台灣茶產業對越南台茶、甚至是其他茶種的需求，而這組本土—進口的矛盾現實，也引起了國內茶業經營者的劃界焦慮。

2.1.3 台灣學術觀點下的越南台茶

然而，越南台茶作為台灣茶產業一部份的歷史，甚少被台灣的學術論著肯認。在相關研究中，1980 年代的台灣茶產業本土化轉型已經被廣泛分析，從而建立起一套以台灣為單位、國族主義與領域主義式的茶產業理解方式。在這個觀點下，越南台茶難以成為研究主體，甚至直接接受越南台茶負面形象，將越南台茶視為來自境外、必須嚴陣以待的威脅，亦有以辨別、排除越南台茶為題的技術應用論文。

這些以台灣為分析單位的台灣茶產業轉型研究，被多數的茶產業研究者沿用、衍伸。蘇怡如 (2011) 針對南投名間鄉茶產業的區域地理研究中，指出「低價混充」的進口茶是對名間鄉中低海拔茶區的威脅之一。WTO、ECFA 等跨國貿易協定與台灣茶產業的討論中也經常處理到相關議題，黃月英 (2011) 針對台灣茶產業面對 WTO 與 ECFA 影響的研究中，將國內茶農化約在開放進口之下弱勢者的位置，政府必須透過原產地標示、農藥殘留管控方式協助農民。周孟燭 (2014) 則提出產業發展上較多元的可能性，並沒有直接採納越南茶的負面形象，而是在

將混用越南茶視為對台灣茶產業的威脅的同時，也將其視為可能的助力，指出台灣茶產業的要旨將是「強化我國本土茶葉與外國進口茶葉之區隔性，或是藉由跨域生產模式加值我國茶產業，為該產業未來重要發展策略之一」。在這一系列研究中，多半透過數則媒體報導推斷越南茶在台灣茶產業中的位置，從而在知識生產的過程中，承襲或再生產越南茶的負面形象。但是這樣的分析方式顯然有所不足，單純的檔案分析當然無法深刻的處理台灣茶產業中的越南茶。

在越南茶被標定為台灣茶產業威脅來源的同時，也有不少研究試圖直接面對這個衝擊，特別是透過原產地標示。Wen S. Chern 等 (2013)、歐于德等 (2013)、張明仁 (2008) 針對茶葉原產地標示與價格的研究中發現，在安全性的考量下，原產地標示台灣的產品價格會比越南、中國的高出超過 50%；這些研究也指出，除非茶葉原產地標示能夠落實，否則這樣的價差並不會體現在實際銷售情形上。這些論文最終導向將原產地標示做為一個邊界形構的過程，邊界管控並非絕對的封閉或流動，而是透過管控在穿越邊界者身上賦予明確的標記。

綜上所述，既有的台灣茶產業研究中，儘管對於整體產業的轉型過程多所發問，從外銷轉內銷、從原料轉精品、從結構集中轉自產自銷、從丘陵轉高山，但是卻忽視了外銷原料的產業體系早已連同經營者、資金、品種、技術和產銷網絡逐次轉移到越南等海外產地，並且因此不完整的詮釋台灣茶產業的轉型。實際上，如同研究背景所回顧的內容，本文認為，台灣茶產業當前的衝突與爭議正式來自於不同行動者對於未來發展的不同想像與實踐。在這些衝突與爭議中，越南茶不僅穿越了邊界，也因為穿越邊界所捲動的衝突與爭議，提供一個窺見邊界生成與運作之機。

2.2 邊界

為了分析越南台茶負面形象，及其反映的全球農食體系與在地取向衝突，本文援引地理學中的邊界概念作為概念架構，探究劃界與跨界之間的矛盾與共構關

係。在當代的政治地理學文獻中，邊界已經不是「a line on the sand」(Newman, 2006) 等一般理解下國家主權展演的前線與極致，而是諸般形式的差異、分化與劃界共同展現的邊界化過程 (bordering process)。接下來，我們將先回顧地理學與其他學科中關於邊界的學術論著，並且逐步聚焦在晚近政治地理學對於更複雜的邊界行動者與場域的分析，進入當前日常化的邊界化過程的討論。

2.2.1 邊界的經驗現象與抽象概念

在討論邊界化過程之前，必須先對邊界 (border) 一詞所處在的知識生產脈絡進行考察。這個概念被理解的方式，總是當時政治地理現象中的移動與封閉密切相關，並且在不同學科中被賦予不同但又緊密關聯的定義，提供一個關於分類 (categories) 的建立、分化與劃界的理解方式。

冷戰結束後的一段時間裡，受到歷史或地理終結的論調，以及關係性觀點的影響，無邊界 (Borderless) 的去分化全球空間想像一度占據主流 (Newman, 2006)。但是在晚近地理現象中，例如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反恐戰爭，邊界一方面對特定的人與貨物流通更加開放，但同時也在各種形式的國家安全考量下對特定的移動性更加封，從而強化以國家為單位的分類劃界。在這些脈絡下，西伐利亞主權國家定義下的邊界，也就是國家主權展演的極限之處，至今仍然卓具解釋力 (John Agnew, 1998)，邊界如何選擇性且更有效率的讓移動與劃界並存，成為新的政治地理核心議題。受到關係性取徑影響的政治地理學 (Reece Jones, 2009a)，也傾向重新思考移動與固著、連結與分化等看似二元、實則並立的現象 (Anssi Paasi, 2009)。

除了前述的政治地理學，在不同的社會科學領域，包括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或其他人文地理學，都有針對各種形式上的分類建立與劃界的研究 (Harald Bauder, 2011; Michèle Lamont & Virág Molnár, 2002)。邊界研究 (border studies) 不僅是經驗現象，也指涉了一系列抽象思考的範疇。因此，實際上我們甚難斷然

將邊界的實際經驗與抽象概念進行劃分，作為概念的邊界永遠和特定時空的邊界現象密不可分。在這些討論中，邊界被賦予兩個層次的理解，首先是傳統政治科學定義下邊界，是西伐利亞民族國家主權展演的極限之處（Agnew, 1998）。其次則是象徵與社會的邊界，包含了社會與集體身分、階級、族裔與種族、性別與性向、專業工作、科學學科與知識等諸多不同的分類的建立與劃界（Lamont & Molnár, 2002）。

邊界作為過程的理解方式，不只要看到分化之前與之後的邊界，更要看到分化如何處在更大的社會脈絡之下。Reece Jones（2009b、2009c）透過印度對於其與孟加拉間的邊界治理的案例指出，邊界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之內的法治例外空間，居民在此的日常生活、經濟活動甚至生命安全，都可以隨著對「安全」的不同理解下被犧牲。而這個例外空間的狀態，必須和印度社會—國家、政策、媒體、人民—如何重新理解威脅的來源一同考量。鄰國的宗教政治關係轉變，或是恐怖攻擊日趨頻繁，導致印度社會重新開始以信仰基礎，進行政治與社會文化層次的邊界劃定。無論是做為經驗現象或是抽象概念，邊界被研究者放回更開闊的研究視野，分類的建立、分化與劃界不再只是案例的背景狀態，更是研究者聚焦的過程；也不再只是發生於邊界線周遭，而是存在於每個分類發生的地方；最後，儘管國家角色並未退去，但非國家行動者也開始被納入考量。

2.2.2 邊界化過程：空間—領域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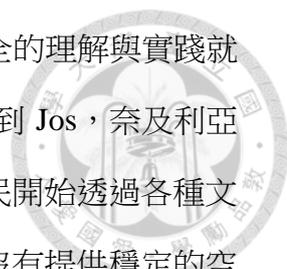
在晚近關於邊界的討論中，邊界不再只是「a line on the sand」(Newman, 2006)，更是一種空間—領域策略（Corey Johnson & Reece Jones, 2014: 8），攸關主權、秩序與安全的實踐。邊界研究開始關注政治邊界以外，更廣泛地分類的建立、分化與劃界。如前所述，邊界不再只是邊界線及其周圍的邊界地帶，更指涉了社會中的邊界化過程；不是協商與實踐的穩定狀態，而是回溯邊界生成之前與之後。因此，邊界研究不再只是關注分類的建立與分化，更要分析這些分類如何被國家與

非國家行動者參與及理解。

對非國家行動者與多孔性邊界的關注，讓邊界的辯論來到下一個階段。此處的辯題在於，如果所有的差異、分類和劃界，我群與他者，都可以包含在邊界這個概念裡面的話，邊界作為一個概念的危機就出現了。邊界會變無所不在，什麼都是，但也因此什麼都不是。邊界做為一個概念，將會轉化為另一個日常的、普遍使用的詞彙，而非有著清晰指涉與發問的學術概念。因此，面對這些質疑，在2011年《*Political Geography*》的專刊中，Corey Johnson、Reece Jones、Anssi Passi、Louise Amoore、Alison Mountz 等新老邊界研究大家一起拋出了下一個問題：「what is the border of border studies?」（Corey Johnson etc., 2011）

實際上，這個辯題已經被同一群作者接下了。2014年 Reece Jones 和 Corey Johnson 編輯的著作第一章的標題就是《*Where Is the Border ?*》（Johnson & Jones, 2014）；而他們答案就印在封面上，《*Placing the Border in Everyday Life*》。Jones 和 Johnson 認為，邊界之所以能發揮攸關秩序、主權與安全的空間—領域技術的效果，有賴發生於非國家行動者與場域、日常化的邊界化過程。而在日常生活中，邊界化過程又是如何運作？我認為，我們必須關注在空間與象徵性邊界如何構成、甚至是共構出我們舉目所見的邊界的效果。

一方面，日常生活必須被納入邊界研究的考量，除了國家行動者主導的邊界政策，人民也可以透過對象徵邊界的理解與實踐分類的建立、分化與劃界，介入邊界化過程。另一方面，儘管當代對於邊界的理解不再僅限於空間邊界，但這並不代表空間邊界不再重要，空間邊界依然是強而有力的我群與他者劃分標準。Reece Jones（2014）在該書中針對大眾媒體節目中如何再現美墨「邊界戰爭」的研究即為一例，作者關注的是空間邊界的運作情形，如何透過節目製播再現給全國各地的觀眾，和美國與他者的象徵邊界互相強化，建構一場從未發生的戰爭。Yakubu Joseph & Rainer Rothfuss（2014）則更關注在非國家行動者如何應對不穩



定的邊界運作情形，在奈及利亞 Jos 的案例中，當地居民對安全的理解與實踐就是一種日常生活中的邊界化過程。當宗教與族裔間的衝突蔓延到 Jos，奈及利亞政府無法穩定的行使國家力量，提供穩定的安全狀態，城市居民開始透過各種文化與宗教象徵區隔敵我，重新定義城市中的安全。當國家力量沒有提供穩定的空間—領域策略，非國家行動者於是開始帶入不同形式的邊界進行填補。因此，在這個意義上，Lamont & Molnár (2002) 所標記的各種社會與象徵邊界和傳統定義下的空間邊界不僅不相衝突，甚至在當代的邊界現象中互為補充。大量越南茶進入台灣後，對國內茶農、茶商造成極大的經濟衝擊，拼配、混茶也嚴重影響台灣茶的本土形象。當政府無意或無力解決這個不穩定的空間—領域策略所造成的經濟與象徵危機，非國家行動者—茶農、茶商—於是開始透過論述越南茶的負面形象，以食品安全、品質風味、經濟與象徵的劃分方式，和空間邊界疊合，重新操作一個穩固的空間—領域策略。

除了非國家行動者在日常生活層次中的邊界實踐，物質性，也就是人與非人，也經常穿越空間與尺度的貫穿整個邊界化過程。如何理解穿越邊界的物質，或是物質如何穿越邊界，則是本文另一個試圖回答的概念提問。在日常化邊界的討論中，為了呈現邊界如何鑲嵌在更大範圍的社會裡，研究中劃界標的或是跨界移動者，多為各種不同形式的文本 (Jones, 2014; Joseph & Rothfuss, 2014)。而在討論人與非人之間的邊界時，物質性也大多被定調為邊界所在的非人造環境。Geoffrey A Boyce (2016) 借用後人文主義地理學中「地勢」(terrain) 的概念，將非人的物質性因素與經典的美墨邊界研究結合。2006 年，美國政府開始推動新一輪的美墨邊界巡守計畫，試圖透過監控科技與荒漠的惡劣環境結合，阻絕非法移民。不同於過去將地勢視為「一種關乎地質、軍事與秩序掌控的權力關係」(Stuart Elden, 2013)，這些物質性因素也可能背離國家力量：荒漠的惡劣環境不只嚇阻了非法移民，也大幅降低邊界巡守人員的效率。透過對邊界地勢的關注，物質性的觀點強調某些邊界運作的過程必然根著於邊界之上，無法由分類、或是相爭性

的觀點可以徹底取代。

然而，如同 Malini Sur(2013)的說法，邊界的運作不能忽視人與物的物質移動性 (material mobility)，移動中的物，例如商品，必然與移動者和邊界運作不可分離。同時，不只國家行動者試圖透過物質性因素從事邊界治理，非國家行動者同樣可以透過操作物質以涉入邊界運作。邊界的空間—領域策略，是一套由人與非人緊密扣連的封閉、穿越或兩者兼備；沒有獨處於邊界的人或非人，而是由人與非人共同形構的邊界化過程。

因此，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何謂越南台茶的物質性？在陳宇翔（2007）在解釋台灣茶產業的本土化轉型過程時，採用壟斷租的社會建構作為分析與詮釋工具，因此否定了茶葉品質、口味或技術的物質性（陳宇翔 2007：133-139）。然而，在該文也承認，台灣烏龍茶確實有其品質、口味差異的物質性，這點在余舜德（2013）針對鹿谷製茶技藝研究中尤其重要。在余舜德（2013）筆下的台灣烏龍茶，是一門難以徹底採行工業化、科學化標準的技術與生產模式。難以捉摸的發酵程度、「看天做茶」和「看茶做茶」的物質性（原文做物性）讓茶人即便使用現代化的製茶機械，也難以割捨傳統的身體技藝。對越南台茶而言，穿越邊界進入台灣最大的障礙經常不是海關的農藥管控，而是要透過品質說服台灣的買家；而所謂越南茶的品質，就是和台灣同季同類茶種的相似程度。因此，浪菁滾筒的轉動速率，炒菁的火力與火候，還有揉茶成形的細緻程度，這些牽涉到茶葉物質性層次—而且經常是深刻鑲嵌在風土之上，例如當天、當季天候與茶葉生長情形—的實踐，都會影響到越南茶能否順利穿越邊界。從越南茶負面形象的案例出發，邊界化過程是一套關於不穩定狀態的空間—領域策略，由國家與非國家行動者，透過一系列超越邊界地帶的論述與實踐所共同生產。邊界化過程一方面處在國家力量之下，和整體社會對安全與威脅的理解密不可分；但另一方面是邊界的特徵—跨尺度、混合與遭遇—又經常能動搖邊界化過程本身。甚至物質性的涉入所導致的非預期與偶發性事件，讓邊界化過程更加難以穩定。為了去回應國家尚未解決的不穩定

狀態，非國家行動者開始涉入邊界化過程之中，帶入安全、品質或經濟與形象的不同分類形式作為補充，強化國家邊界，或是創造邊界的可穿越之處。



第三章 研究方法

在本章，本文將會依序說明本研究的田野工作、資料蒐集方式以及研究限制。首先將會針對本研究的田野工作進行說明，包括在三次較長時間的越南移地研究，以及部分在台灣進行的訪談。接下來，我們將根據第一章所提出的三個研究問題陳述研究方法。由於本文四、五、六三章內部的章節安排，大致上即是根據三個研究問題鋪陳證據、進行論述。因此，接下來不會根據不同的研究方法分門別類撰述，而是以研究問題為單位，依循本文從資料蒐集到論證的過程，探究本文的研究方法。在本章的最後則是針對研究者身分帶來的研究限制的分析。研究者身分，以及相對應的進入田野方式和語言，對本研究的資料蒐集有極大影響，甚至必須是作本研究分析、論證的一部份，因此於正文開始前，於研究方法的章節一併交代。

3.1 田野工作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包含田野工作與檔案資料蒐集；在依據三個研究問題分述之前，在此先針對國內與國外的田野工作的部分進行統合性的說明。而這三個研究問題所需的證據，需要進行移地研究，包括 2015 年七月、2016 年六月到八月以及 2017 年八月的田野工作；除了前述越南中部高原南端林同省有較密集的烏龍茶產業，也到越南北部邊境方興未艾的台資茶園進行調查。而移地研究的訪談對象，包括先後投入的越南台茶經營者、日益減少的台籍師傅、逐漸增加的越資茶廠、以及烏龍茶生產相關的其他產業。這也同樣是研究限制之所在，因為語言和經費因素，我難以觸及越南茶工、大多數的越資茶廠或是地方官員；而我能夠接觸到的越資茶廠，也侷限在少數由中文流利的越南華人經營者。實際上，根據已經蒐集到的資料所示，截至目前為止，台越之間的烏龍茶貿易，仍然是以台灣背景的經營者、茶農、茶商與政府為主要行動者；相對的，逐漸起步的越南烏龍茶市場，則主要由越資茶廠把持。

如同第二章第一節提到的，越南台茶的種植、製作，主要集中在林同省 20 號公路沿線的寶路 (Báo Lộc)、夷靈 (Di Linh)、德重 (Đức Trọng)、林河 (Lâm Hà)、大叻 (Đà Lạt) 等地。根據台商商會林同分會的資料，2015 年共有 26 家會員從事茶葉種植、製作、銷售、採購；同時也有部分茶產業的周邊產業，包括農藥或肥料經銷、機器、其他耗材等。我透過關鍵報導人，也就是接下來文中阿伯、阿姨和阿湧一家人的引介，在 2015~2017 年的三次移地研究間，本研究與 13 家越南台茶經營者進行了超過 20 次的訪談；並且在關鍵報導人的茶廠，針對製茶過程進行總共約兩個月的參與觀察。我的關鍵報導人是目前最資深的越南台茶經營者，過去曾經擔任台商商會林同分會會長，其經驗及關係網絡應具備足夠的可信度與代表性。除此之外，我也在網路媒體開設的專欄，與其他越南台茶經營者展開聯繫。



圖 2 越南林同省田野地點地圖 (作者自製)

除此之外，越南台茶作為台灣茶產業中隱晦不見、難以識別、卻又無所不在的物，並非只有越南台茶經營者才會討論。在台灣各地的茶展、茶店或茶園裡，國內茶農、茶商，也經常召喚與回應越南台茶的負面形象，藉以界定自身的獨特性與價值。這個「自身」可能是指整體台灣茶產業，也可能是該經營者的產品。

這些國內茶農、茶商也許沒有和越南茶直接接觸的經驗，甚至並不明瞭爛、毒、混負面形象的詳細內容。但是論述越南台茶的負面形象，經常被國內茶農、商視為能有效召喚消費者共鳴與消費欲望的行銷方式。因此除了移地研究之外，我同樣也在台灣的茶園、茶店或茶展中，觀察越南茶如何不知所在、卻又無所不在。最後，為了確保不會洩漏受訪者的身分，本文所有受訪者皆代以假名；一些比較具爭議性的訪談內容，則用更扁平的「某位受訪者」代稱，避免該受訪者的身分被其他同行察覺。

3.2 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由於本文四、五、六三章內部的章節安排，大致上即是根據三個研究問題鋪陳證據、進行論述。因此，接下來不會根據不同的研究方法分門別類撰述，而是以研究問題為單位，依循本文從資料蒐集到論證的過程，探究本文的研究方法。

台灣與越南的茶業經營者如何講述、回應與挪用越南台茶發展歷史及負面形象，藉以定義其心目中「台灣茶產業」的範圍？

第一個研究問題將結合訪談和檔案研究，建立我對越南台茶及其負面形象的認識，以及更詳實的越南台茶產業發展脈絡，同時掌握受訪者對於台灣/越南台茶產業發展的態度，銜接第二道研究問題。

檔案研究主要包含三個部分，分別是報章媒體論述、史料蒐集和越南台灣茶產業經營者留存的資料。如同 Klaus J. Dodds (2004) 所呈現的，各種形式的媒體所呈現的內容總是對大眾對於議題的理解有所影響，無論是否能夠將其視為主要行動者。Anna Korteweg & Gökçe Yurdakul (2009) 和 Deenesh Sohoni & Jennifer Bickham Mendez (2014) 也指出，報章媒體是理解社會中象徵性邊界劃分很重要的工具。Reece Jones (2009c) 在探討印孟邊界地帶如何在恐怖攻擊的威脅與敘事下轉為權利特區時，除了針對印孟邊界兩側村民的田野工作，關於恐怖攻擊、

宗教與國族的論述，也多有參考媒體報導、投書或政治辭令的邊界地帶以外的證據。而在 Reece Jones (2014) 討論日常化的美墨「邊境戰爭」的研究裡，則是以大眾媒體製播的節目為主題，進行文本分析。因此，整理歷年來越南和台灣茶產業食安事件的新聞報導、書寫方式，將有助於了解越南台茶負面形象的演變過程。這。最後，本研究的檔案蒐集也包含越南方面對於台灣茶農、商、品種、資金和技術轉移的記載，了解不同觀點下的越南台茶發展歷程。

史料蒐集的部分則是回顧台灣茶產業相關書籍、刊物、專著，整理其中對台灣茶產業發展過程的描述，特別是處理到越南茶、進口茶的部分。本研究使用的史料除了《茶訊》等相關出版物之外，由徐英祥翻譯、製茶公會在 2011 年出版的《台灣茶業調查報告譯集》提供大量日治時期的官方記載，有助於更細緻的理解戰前的台灣茶產業，同時也是相關研究尚未處理、使用過的史料。為避免單方面採信官方文獻的風險，越南茶葉台商留存的檔案，包括照片、公文、相關認證或其他記錄也是本文檔案研究的範疇，以蒐集越南台茶發展過程的相關證據。

訪談的部分，由於第一個研究問題中涉及較深入的歷史縱深或實際經驗，因此聚焦於正在或曾經投入越南台茶的投資者、茶農和製茶師，或是國內資深茶商與相關研究者，邀請受訪者重述自身的從業經驗。這些經驗除了幫助我建立對越南台茶發展脈絡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在受訪者講述歷史的過程中，如何同時引導他們透露自身對越南與台灣茶產業的理解方式。這部分的訪談主要係透過於越南的移地研究進行，包括 2015 年七月、2016 年六月到八月、2017 年八月的田野工作；除了前述越南中部高原南端林同省有較密集在台資茶園，也到越南北部零星的台資茶園進行田野工作。而根據本研究的觀點，不同的理解方式和不同劃界方式緊密相連；受訪者對於越南台茶負面形象的回應，往往也同時反映了他們對「台灣茶未來走向」以及「何謂台灣茶」的看法。這些言說層次的訪談資料，將有助於我理解下一個研究問題中，更具實踐性、甚至是第三個研究問題中難以言說的訪談與觀察資料。

台灣與越南的茶業經營者如何在食安、產業發展的爭論中，重新定位自身在產業中的位置與發展方向？

第二道研究問題將透過訪談進行。緊接著前一小節論述層次的問答，此處的訪談聚焦在茶業經營者面對全球農食體系與在地取向的辯論中，如何調整自身的立場與經營策略。此處訪談目的，在於理解不同經營者如何在實踐層次上回應多孔性邊界與產業轉型帶來的挑戰。遭逢這個挑戰的，除了在越南台茶經營者，國內茶農、茶商同樣受到影響，因此也納入本題的訪談對象。言說差異反映了社會如何看待邊界，但是面對差異實踐地回應，才能說明邊界如何生成、穩定或流變。本題所謂的「調整」，聚焦在經營者面對茶產業的變遷時，包含新的應用技術、品牌建立、市場方向、產量調整、農藥管控、農法選擇、轉作，甚至考慮認賠殺出。這些農場、商場前線的具體應對，提供我理解茶葉生產與邊界化過程所需的證據。

台灣與越南的茶業經營者如何透過經營策略調整的實踐，藉由茶與茶葉生產的差異，涉入國家與象徵性邊界的運作？

最後一個研究問題的研究方法包括參與觀察以及最終的資料分析。茶葉生產與經營策略上的實踐，通常不只、也很難僅透過訪談或是檔案資料理解。但是這些言說或文字以外的部分，往往更直接地說明茶農、茶商或製茶師傅面對邊界運作的進退應對之道。因此，我的田野工作除了透過訪談蒐集之外，報導人和訪談對象之間的互動同樣十分重要，技術轉移、市場動向的交流往往就是在這個時候發生。由於本研究聚焦的林同省茶區範圍較大，茶廠間往往需要一個小時以上的車程，茶農之間的交流與互動並不是件日常的事情。因此，在我的田野工作中，經常可以觀察到報導人和訪談對象同時也在交流最近的資訊，包括副產品技術、製茶機械的差異、最近哪一批茶的品質好壞、之後的農藥檢驗政策等等。換言之，在進行前兩題所需的訪談時，我也同時身處在越南台茶的關係網絡中，觀察不同

經營者如何涉入邊界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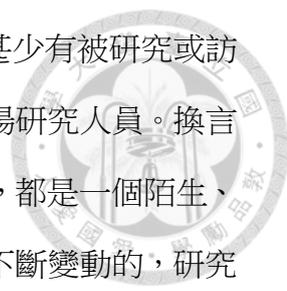
茶廠內的製茶過程，則是另一個難以僅透過訪談或檔案蒐集資料之處。一般關於茶產業的參與觀察，應該是指研究者要直接參與茶葉的種植或製作過程。但是本研究關於茶葉生產的參與觀察，則是因為語言與身分的隔閡，讓研究者轉換到「監工」的身分，以一個受限但另類的位置進行參與觀察。關於我在越南台茶經營者之間、或是在茶廠參與觀察時的研究者身分轉換，在 3.3 研究限制的部份會詳加說明。身分轉換下的參與觀察，讓我直接進入越南台茶空間與象徵性的邊界運作之中，成為劃界焦慮層層轉嫁的其中一個環節。這些身體性、情緒性的經驗，讓我得以連結越南台茶的製茶過程與負面形象的劃界，建立本研究空間與象徵性邊界運作的分析框架。

3.3 研究限制

本研究田野工作面對的限制與挑戰包括越南台茶負面形象本身、語言與身份。越南台茶的負面形象不僅是本研究未來關注的重點，也是要面對的限制與挑戰。由於長期受到負面形象的陰雲籠罩，越南台茶經營者們對台灣訪客十分戒備，移地研究只能高度依靠關鍵報導人的引介。在國內所進行的訪談與資料收集中，越南台茶更是一個十足禁忌的話題與立場，必須透過更多旁敲側擊訪談設計與身份表述的方式取得資料（例如前述茶展、茶店的訪談方式）。如同本章第一節所述，為了保護受訪者，文中所有援引的訪談資料皆以假名呈現。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也面對極大的語言限制。當前的越南台茶，勞動力幾乎完都是由越南茶工組成，同時也有越來越多越南人自行開設茶廠。在經費不足、無法聘請翻譯的情況下，我無法直接和茶廠內的越南茶工進行溝通，也無法訪談越南人開設的台式烏龍茶廠。另外，在茶廠內部的資料蒐集，同樣受限於語言，只能以簡單的越語和手勢溝通，無法針對越南茶工進行訪談。因此，我在茶廠內的觀察重點，限制在原本就無法透過言語傳達的製茶細節。

最後，本研究最大的挑戰，是我在田野中不斷變動的身分。做為一個長期位



在研究與大眾關注以外的人群與地點，林同省的茶業台商過去甚少有被研究或訪談的經驗，只有零星的記者，以及進行土壤、茶種採樣的茶改場研究人員。換言之，長期蹲點的田野工作者對越南台茶經營者和越南茶工而言，都是一個陌生、模糊的身分。因此，做為一個田野工作者，我在茶廠的身份是不斷變動的，研究者的身份難以識別，取而代之的是報導人的親族、意圖不明的台灣來客、或是即將上任的台籍幹部。關鍵報導人在將我引介給其他同行時，都是家族中在台大唸書的晚輩；實際上，在我長時間進行參與觀察的茶廠，過去也有其他從頭開始學習做茶、管理的家族成員——在田野中，無論是監工或是家族企業成員，這些身份或許都比「研究者」更好理解。這些新的、動態的身份，一方面讓我無從蒐集越南茶工的資料；但另一方面，在第五章也會提到，監工的身份反而讓我直接置身於越南台茶的品質管理之中，成為邊界運作的其中一個環節，以最身體感官的方式完成資料蒐集。

第四章 毒茶：農藥使用、食品安全與劃界

在台灣的新聞，乃至於我的訪談經驗中，「毒」大概是越南茶最常被提起的一個負面形象：也就是農藥殘留或落葉劑傳聞等食品安全的爭議。如同在第二章第一節的回顧，台灣曾發生數次茶產品農藥殘留超標的食安事件，越南台茶都被視為罪魁禍首——儘管，實際上，由於台灣茶產業慣行的拼配技術⁵，台灣的檢調單位幾乎都無法查明，農藥殘留超標茶葉的確切來源國。但是，這並不妨礙台灣茶業經營者，乃至政府和消費者，將越南茶視為食安事件的罪魁禍首，無庸置疑的「毒茶」。

或許是太常被買家質疑了，越南台茶經營者們大多隨時準備著足以證明清白的各式文件（或文件的截圖、照片，在這個可以用社群軟體談生意的年代）。但是千言萬語，或是任何檢驗報告，都比不上第一次田野時，在 **uncle** 的農場裡的「眼見為憑」更具衝擊。**Uncle**，一位越南台商，在朋友引介之下來到越南投資茶廠；後來發現種茶辛苦、難賺，於是改種咖啡。下圖 3，是在 **uncle** 的咖啡園，與隔壁越南農民自家後院的咖啡園交界拍的。我曾經把這張照片上傳到社群網站，讓大家想想照片中哪一邊是台商 **uncle** 的農場、哪邊是越南農民的農場？比較少人覺得左邊是台灣的，理由多半和後面的檳榔樹有關，覺得台灣、台商比較可能密集地使用土地，或是以檳榔樹標誌地界。大部分的人都覺得右邊草除得很乾淨的是台灣的農場，理由千奇百怪，有些人覺得台灣人比較勤奮草除得比較乾淨；更多人的反應是台商比較肯下成本，農藥用更多，下了除草劑，所以地面寸草不

⁵ 關於拼配技術於台灣的使用情形，詳見第六章。

生。



圖 3 台商咖啡園和越南農民農場交界處，農藥使用差異壁壘分明。（作者攝影）

這些答案或多或少反映了台灣人對進口農作物，當然也包括越南茶的想法。正確答案是左邊、地面都是草的是 uncle 的農場。Uncle 說，由於他的咖啡大部分都要賣回台灣，若被台灣海關驗出殘留超標就會被退櫃或銷毀，損失幾百萬台幣，所以他不敢用除草劑，農藥也只是對症下藥。咖啡園和茶園的考量或許有所不同，但是在農藥使用，特別是面對海關檢驗風險上，卻是沒有太大差異的。越南台茶經營者，同樣也會考量到海關檢驗的風險，而調整農藥使用情形⁶。

Uncle 或是其他越南台茶經營者的考量，呼應了政治生態學取徑下，農藥使用議題的研究成果。在第四章，我們將會從越南茶農藥殘留的爭議出發，依循 Ryan Galt (2008) 對於農藥使用情形的分析，關注物種特性與管制風險如何影響

⁶ 此處指稱的越南台茶的管制風險，包括進口台灣時進行的海關農藥抽驗，以及經營者們的自行送驗。海關農藥檢驗的密度係隨政策調整，一般情形是抽驗 5%，但是在 2015 年 4 月之後一度調整為逐櫃逐批查驗。自行送驗則無強制要求，但由於中下游盤商、茶行在簽之前通常都會有所要求，因此越南台茶經營者們雖然不一定會每一批茶都送驗，但至少確保手邊有近期的檢驗報告。

越南台茶的農藥管理，分析食品安全如何作為行動者介入空間邊界與象徵性邊界交互運作的標的與節點，重新定義移動所需的身分與條件；換言之，也就是空間與象徵性邊界運作的變遷與現狀。最後，我們會試圖將這個問題更進一步：越南台茶經營者，如何確保其產品，能夠穿越「食品安全」的空間與象徵邊界？

4.1 爛茶的負面形象與農藥矛盾

如同本章一開頭所說，食品安全的爭議，是越南茶在台灣最常見的負面形象；也是台灣茶業經營者、消費者乃至政府在區別國內茶與越南茶時，最常指稱的差異——也就是，象徵性邊界。同樣的，當台灣希望劃立起更嚴苛的空間邊界時，農藥殘留檢驗也是最常見、直接的政策手段。

1995 年，台灣的報紙上首次出現越南茶的負面報導，當時是這樣說的：

「行政院農委會昨天提出「台灣茶葉產銷面臨之問題與展望」報告指出，台茶的最大威脅是大陸茶和越南茶，為了避免台茶受衝擊而萎縮，農委會已建議經貿單位，貫徹大陸茶禁止進口的政策，並且設法蒐集越南茶園農藥施用情形，以加強進口檢驗，來達到減少進口的目的。」(王淑瑛，1995/04/29；粗體為作者所加)

面對越南茶的挑戰，台灣政府最初的打算是設立貿易壁壘，但是考量到當時正在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因此不了了之：

入關策略小組認為，全面管制茶葉進口不可行，但因越南不屬於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現階段對越南茶葉採取階段性限量進口，或要求其自我設限，應該不致影響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入會案，不過，長期而言，仍不宜採取這種違反自由化的措施。(張海琳，1996/03/01)

貿易手段行不通之後，食品安全，主要是農藥殘留檢驗，還有隨後浮現的落葉劑疑雲：

標檢局懷疑越南茶葉可能含農藥和化學武器殘留物質，與行政院農委會和衛生署

協商後，決定自七月一日起將進口茶類貨品列入應施檢驗項目……標檢局表示，一般發展較慢地區農民比較缺乏使用農藥的正確觀念，越南進口的茶製品不但可能有殘留農藥；更危險的是，越戰期間，美軍為了反制越共的叢林游擊戰，曾在越南大量使用化學武器，包括 DDT、落葉劑、殺菌劑、DDE 等化學物質（丁萬鳴，1999/06/10）

如同我們在第三章第一節提到的，1990 年代正值李登輝政府推行「南向政策」，試圖減輕對中國逐漸加深的經濟依賴，以及技術、資金的輸出，從而確保台灣經濟與抽象上的「本土」。越南茶的投資，一方面回應了當時國內的原料茶需求，另一方面也暗合當時台灣政府的經濟方針⁷。然而，南向政策始終是一個帶有本土保護主義色彩的政策，所以可以想見的，當南向茶農威脅到國內茶農乃至台灣本土時，台灣政府不會假以顏色。論述食品安全問題、甚至考慮樹立貿易壁壘，就是 1990 年代台灣政府對越南台茶的態度。而農藥使用和落葉劑傳聞，無論是真是假，就是當時、並且一直持續至今，用以重新界定並保護「台灣茶」的劃界行動。而這個邊界的運作，一方面是空間邊界的，透過海關的農藥殘留檢驗政策，強化台越之間主權國家邊界的篩選效果；另一方面，這個邊界運作也是象徵性的，透過召喚越南茶的負面形象，使越南台茶在市場中不被接受，或是價格低落，進而落入台灣茶市的邊緣位置。

從此，食品安全爭議成為越南茶在台灣最廣為流傳的負面形象，歷次越南茶登報，也幾乎都是從或真或假的農藥殘留超標開始，延伸到其他批評。在 2000 到 2004 年之間，關於越南茶的報導一時間不復見於媒體版面。當時台灣茶葉景氣繁盛，供不應求⁸。許多受訪者均表示，2000 年代前期是生意最好的時候，許

⁷ 本文此處使用「暗合」一詞，係因截至目前為止所接觸到的越南台茶經營者，均表示台灣政府從未提供任何政策上的優惠。即便是 2016 年以後推動的新南向政策，根據外交部派駐河內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官員表示，也沒有對越南台茶經營者提供直接幫助。

⁸ 根據製茶公會中資深經營者的說法，當時台灣茶市中烏龍茶供不應求的現象，來自於供需兩端的巨大變化：九二一大地震所導致的大幅減產，以及小三通和開放陸客來台之後激增的茶葉伴手禮消費。

多投資者也是在這個時期來到越南；根據阿伯的回憶，當時榮景是「船剛到台灣，盤商就來搶著買」，甚至曾經「有茶是搭飛機回台灣的！」。不只是越南，也有台灣高山茶農回憶，至少到 2000 年代前期都還不太會被砍價，「盤商會算好我們什麼時候有茶，當天就開車上來全部包走」。換言之，當時台灣茶，至少在沖泡茶市場，應該是一個供不應求的賣方市場，在沒有急迫競爭壓力的情況下，同樣也就沒有劃立邊界、排除他者的必要。

不過，到了 2004 年底，由於當年冬茶歉收，國內茶產量減少，越南茶的負面新聞再次見於台灣的報紙上。2007 年 4 月，陸續有立委、茶農抗議，要求保護國內茶農，禁止越南茶進口（莊芳銘，2007/04/20）；隨後的半年內，越南茶接連發生農藥殘留超標的事件，食品安全的爭議從此浮上檯面。從該年 5 月到 11 月，一連有二批茶葉農藥殘留超標（程嘉文、祁玲，2007/07/27；施靜茹，2007/07/28；陳惠惠、朱淑娟，2007/11/26）。弔詭的是，這二批茶葉都是在流入市面之前，即由海關驗出、退櫃；台灣自 2000 年開始檢驗進口茶葉農藥以來，海關驗出農藥殘留超標雖非首次、但也絕不罕見⁹。這些對越南茶農藥殘留的報導，不只是單純的負面新聞，更是負面形象的建構與強化。

2009 年，越南茶再次和農藥殘留超標牽連在一起：故宮博物院販售的台灣南投產烏龍茶被驗出農藥殘留超標。故宮博物院作為台灣代表性的觀光景點，所販售的台灣代表性特產出現食品安全疑慮，自然引起軒然大波。隔天的報紙上，出現了一則令人玩味的標題《此茶非「我茶」？劃清界限¹⁰ 名間茶農喊冤》（江良誠等，2009/11/17），「我茶」既是農藥殘留超標茶葉的供應商名稱，更是隱喻整體台灣茶產業。「劃清界限」一句，更是讓本文的核心概念「邊界」無比生動。農藥殘留，也就是食品安全的爭議，不只是透過海關運作的空間性邊界，更是台灣茶產業理解台越茶差異的象徵性邊界。

⁹ 根據 2016 年食藥署公布的數據，當時半年內越南茶農藥殘留超標率約 3%。

¹⁰ 應為線，原文標題誤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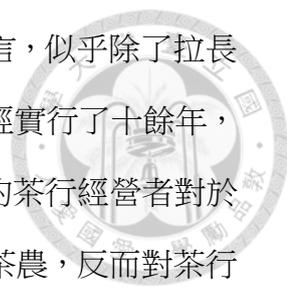


儘管越南茶在台灣歷盡各種或真或假的食品安全新聞，但由於沖泡茶終究和台灣人、特別是年輕世代的日常生活較遠，歷次負面事件的衝擊，都比不上 2015 飲料茶的食安事件來的影響深遠。2015 年 4 月，台灣數家知名飲料茶業者原料接連被驗出農藥殘留超標，引起一系列衝擊整體台灣茶產業的食安風暴。此次事件並非台灣茶葉農藥殘留超之首例，媒體報導、輿論很快地和過去幾次越南茶相關新聞進行連結；但是在相關單位追查之下，這批農藥殘留超標的茶葉是來自台灣中部的中低海拔茶區的茶廠。但是，就算一路追查到上游茶廠，由於台灣茶產業慣行拼配的緣故，也無法由此斷言此次的罪魁禍首是國內茶、還是台灣茶。

台灣政府旋即下令依據當時的農藥殘留標準，徹查茶葉原料的農藥使用情形。國內茶的部分，食藥署和各地方政府衛生局抽驗市售茶飲料原料(食藥署, 2015a)；截至 2015 年 6 月 17 日，抽驗 899 件中農藥殘留不合格率為 7.9% (食藥署, 2015b)。針對進口茶的部分，食藥署宣布從 2015 年 4 月 24 日起，越南等四國之進口茶逐櫃逐批檢驗(食藥署, 2015c)。一般來說，越南台茶的「一批茶」就是前後數天(天數端看當時茶菁數量而定)，同品種、品質¹¹接近，生長與製作階段天氣條件相似的茶葉；而一個貨櫃裡面，也會有前後數批茶葉——球狀烏龍單位重量的體積較小，一櫃可以到十批左右；條狀紅茶比較占空間，一櫃的批數較少。

面對食安事件，台灣政府看似對國內茶與越南茶都進行了更密集的檢驗；但實際上，這一系列政策施為透過隱晦地不對稱處理國內、越南茶，提醒了我們空間性邊界的存在。一般而言，越南台茶經營者需要負責將茶運進台灣，才會轉手與盤商。換言之，海關的逐櫃逐批查驗，是直接面對越南台茶經營者進行的。相較之下，國內的檢驗是針對茶飲店所持有的茶葉原料，而非必須對農藥使用負責的國內茶農。從農藥管理的角度而言，2015 年飲料茶食安事件的後續處理，其實就是一次空間性邊界運作的調整，究其目的，則是為了紓解相對應的象徵性邊界混淆危機。

¹¹ 關於越南台茶的「品質」，詳見第五章。



然而，這次針對性的政策調整，對許多越南台茶經營者而言，似乎除了拉長通關時間以外，沒有太大影響。對他們而言，海關農藥抽驗已經實行了十餘年，自主管理、自主檢驗是各家吃飯的基本門檻¹²。一位不願具名的茶行經營者對於只針對越南台茶這件事十分不滿，認為使用國內茶、支持國內茶農，反而對茶行更沒有保障。我的關鍵報導人阿湧也告訴我，他有一個合作對象，專門進越南茶交日本的單，因為進口到台灣的越南茶葉至少已經通過海關檢驗。當台灣茶產業，乃至台灣的消費者和政府將越南台茶視為毒茶，並且試圖以此區辨、排除越南台茶的時候，越南台茶經營者們卻是對此毫不擔心。何以如此？

這個對於農藥使用情形認知上的落差，被 Ryan Galt (2008) 稱之為農藥矛盾 (pesticide paradox)。Galt 發現，在一般的認知、以及過去的研究中，普遍相信非傳統出口型作物 (non-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exports, NTAEs) 的農藥使用情形，會比傳統的內銷作物更加氾濫。但是 Galt 透過其在哥斯大黎加的採樣分析發現，這樣的比較不僅不對稱，甚至結果有時會出人意料。一方面，不同的作物種類理所當然的需要不同的農藥使用；另一方面，外銷作物為了因應管制風險，往往必須落實更精細的農藥管理。由此，Galt 歸結出三個考量農藥使用情形時不能忽視的因素：品種特性、市場價值與管制風險。台灣的烏龍茶產業，在越南林同當地就是典型的 NTAE 作物；同時，當越南台茶進入台灣之後，其農藥使用情形也備受質疑。因此，在接下來兩節，我們將會依循 Galt 的指引，探究越南台茶的農藥使用情形，回答本節遺留的問題：NTAEs 的特性，如何影響越南台茶使用著的農藥管理？為何越南台茶經營者從不擔憂更嚴苛的海關檢驗標準？從不擔憂「毒茶」的批評會造成實質傷害？從不擔憂以「安全」為軸心的空間與象徵性邊界運作，可能會將越南台茶排除在外？

¹² 關於這個「基本」何以建立，詳見本章第二、三節

4.2 管制風險、市場價值與品種特性



如同前文所說，越南台茶經營者們幾乎隨時都準備著各式農藥殘留檢驗報告，證明自家產品安全無虞。他們雖然都很痛恨台灣市面上流傳的種種越南茶負面形象，但是提到食品安全、提到農藥管理、甚至是提到落葉劑的爭議時，反應卻更像是不屑一顧。我們第一次赴越、2015 年的移地研究時，恰逢飲料茶農藥殘留超標，食藥署下令海關逐櫃逐批檢驗。阿元，一位茶機師傅出身，後來在越南成家立業、自立門戶的經營者，甚至認為檢驗越嚴格越好，剛好證明越南台茶的清白。鍾老闆更乾脆，他有幾十公頃通過歐盟有機認證的茶園，農藥殘留檢驗根本不是他會考慮的事情。

越南茶的農藥使用情形，遠非在台灣流傳的負面形象，也和一般對 NTAEs 想像有所不同。Ryan Galt (2008) 認為，管制風險、市場價值和品種特性是影響農藥使用的關鍵因素。而在越南台茶的案例中，市場價值的影響較不明顯，或者是本研究還未能深入接觸「價錢」這等敏感的問題。在第四章第二節，我們要先討論品種特性如何影響越南台茶的農藥使用情形，並且構成越南台茶發展以及邊界運作的基礎；至於管制風險，以及經營者們的農藥管理模式，則是第四章第三節要處理的問題。

要探究越南台茶的農藥使用情形，首先必須追溯到 1990 年代，台灣經營者展開茶種轉移之初。在圖 3 中，我們看見的是除草劑使用上的差異；但除草劑只是農藥的其中一種，此外還有需要對症下藥的殺蟲、殺蟎、殺菌劑等。而這些藥劑的使用，往往必須依據蟲害情形、天候、採收時間、甚至是更細緻的品種特性進行調整。1990 年代，越南台茶經營者們開始投入品種、技術引進之初，就發現當地除了台灣常見的椿象、紅蜘蛛和小綠葉蟬等蟲害，最嚴重的是一種他們稱之為「蛀心蟲」的蟲害。根據越南台茶經營者們的說法，蛀心蟲進入茶樹之後，會沿著枝幹內部一圈一圈向上蛀蝕，成蟲之後才離開茶樹；屆時，茶樹的養分輸送

遭到嚴重的破壞，往往也經不起折騰，產量大減，直至枯死。

根據農委會茶改場的資料，前述的蟲害情形應該和咖啡木蠹蛾（*Zeuzera coffeae* Niether）或茶彫木蛾（*Casmara patrona* Meyrick）：

初孵化的幼蟲自幼嫩枝條或嫩芽鑽入，沿木質部蛀食，形成一橫環食痕，因水分不能上升，被害植株上部枯萎，幼蟲沿髓部向下蛀食，把木質部吃掉，形成隧道，穿入粗莖，在幼木茶樹，此隧道可能直伸入主根，受害枝條枯萎，枝幹逐漸枯死。成木若僅有一枝條受害則影響不大，但在幼木茶樹，若主莖受害，則導致全株枯死，影響甚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2004）

這些所謂的「蛀心蟲」，在 1990 年代初期，讓那些最早投入台灣烏龍茶種轉移的前輩們頭痛不已。尤其最初轉移的品種的青心烏龍，即便在台灣也是讓茶農頭疼不已的嬌生慣養，初來乍到林同省時更是死傷慘重。



圖 4 咖啡木蠹蛾（資料來源：茶業改良場）

在諸多台茶品種之中，越南台茶經營者們最後發現，台茶 12 號、也就是俗稱的金萱、二七仔，在越南適應的比其他品種都好。根據茶業改良場的資料，金萱「芽密度高，樹勢強，高產，採摘期長，抗枝枯病」¹³。在越南的茶業技術文獻中，記載了金萱於 1994 年引入，特色為早發、生長力強、產量高、抗蟲害能

¹³ 品種特性簡介，茶業改良場。取自 <http://www.tres.gov.tw/view.php?catid=1668>（2017/09/21）

力強、抗旱能力普通，茶樹為分岔、叢生、密集、的灌叢 (Do Van Ngoc, 2012)。台灣茶市起起落落，價錢最好的始終都還是青心烏龍，其次才是金萱、翠玉、四季春等不同品種。這些品種，今日在林同省茶區仍有種植，但多數品種無非是在價格起落時，用以拼配出不同的風味，權當分散風險。唯有金萱適應最好，種植面積最大，產量最大；不僅茶園管理好、做出奶香的單賣出上佳的價錢，品質稍次的產品也能用作拼配的基底，偶爾也會有意想不到的風味。在參與邊界運作，越界而來之前，台茶和台茶經營者們必須先在越南站穩腳跟；而金萱，以及它的品種特性，已經被證明是越南台茶發展的基礎。

在這諸多特徵之中，金萱真正最「接地氣」，使其稱霸林同省茶區的，是它分岔叢生的枝幹。被蛀心蟲侵入之後，因為各枝幹分岔叢生、獨立生長，金萱的枝幹仍然能夠繼續生產茶葉，而非依賴大量殺蟲劑。相較之下，無論是台灣的青心烏龍，或是越南當地的大葉種阿薩姆，都是從單一主幹出土後分岔。如此一來，即便部分茶枝遭到蛀蝕，該茶樹也不會立即死亡，可以透過折枝等物理性手段解決。圖 5 是一株遭到蟲害的金萱，根據阿湧的說法，這株已經稀落到沒有產量，準備挖掉了；圖 6 則是疑似遭到蛀心蟲蛀蝕的茶樹枝幹。



圖 5 遭到蟲害的金萱。(作者拍攝)



圖 6 疑似遭到蛀心蟲蛀蝕的茶樹枝幹。(作者拍攝)

金萱抗蟲害的特性，也讓越南台茶經營者們在邊界運作生變時，可以更有彈性的進行農藥管理。在年景不好時，有些人乾脆就停了部分茶地的農藥，減少產量，降低成本。2016 年，也就是我進行第二次移地研究時，整個林同省茶產業可謂一片蕭條。先是 2015 年飲料茶農藥殘留超標事件後，新的政策讓越南台茶經營者們被迫更進一步讓利予盤商；隨後民進黨政府和中國關係僵化，高度依賴陸客消費的台灣烏龍茶市需求大減。隨後一場乾旱來襲讓阿伯、阿姨原本就缺水茶地大受打擊，甚至讓隔壁縣、當年全越南最早投入台灣茶種轉移的茶地整片枯死。於是，越南台茶經營者們紛紛減產，部分茶地只維持基本的農藥、澆水。余老闆

是農場的第二代，不過茶樹、茶廠是他十餘年前剛來的時候投資下去的；2016 年吳老闆看茶市太差，就乾脆讓樹齡十餘年、有點老化的第一批茶樹、茶地休息。圖 7 到 9，是 2015~2017 年我在差不多的角度拍下的照片，可以看到 2015 年還十分整齊的茶地，到了 2016 年就缺了一塊，整片茶地是青黃不接；到了 2017 年，雖然恢挖掉的茶樹沒有補上新苗，但終於還是恢復生產了。



圖 7 2015 年的茶園一角，當年雨水尚稱充足，茶市也還沒徹底轉壞，茶園生長、管理狀況良好。（作者攝影）



圖 8 2016 年的茶園一角，可見大量茶樹死亡，挖除之後並沒有補上新的茶苗。

(作者拍攝)



圖 9 2017 年的茶園一角，茶地重新恢復生產，但去年挖掉的茶樹也沒有補種新苗。(作者拍攝)

茶枝分岔叢生的特性，也許不能直接地讓茶樹植株在面對蟲害時更有抵抗力，但是卻讓越南台茶經營者們得以更有彈性地在產量、蟲害與管制風險間進行農藥管控。金萱生命頑強、抗蟲害的品種特性，讓越南台茶經營者可以更靈活的運用手頭緊湊的資金，度過天災人禍；同時，金萱本身的品種特性，也讓它得以在千里之外的林同省高原上站穩腳跟，徹底改變當地的農業地景。在這裡，我們看見物質性的初步浮現：金萱本身的品種特性，是越南台茶發展的基礎，也是整套邊界運作的基礎。我們會在第五章再次展開關於物質性的討論，接下來我們要繼續探討的問題是：金萱的品種特性讓越南台茶經營者能夠更有彈性地進行農藥管理，那麼，越南台茶經營者的農藥管理，究竟又是如何進行的？

4.3 管制風險與越南台茶農藥管理

儘管農藥—殺草、殺蟲、殺蟎、殺菌劑—的使用，可以在前述各種情境下透過各種意圖或非意圖的方式減少，但現實仍然是，所有慣行農業都無可避免地需要使用農藥。因此，對越南台茶經營者而言，重要的是如何追蹤、緊跟台灣和其他可能市場的農藥使用規範？在掌握農藥使用規範以後，又要如何確保田間的農

藥使用？這一節想要呈現的是，越南台茶的農藥管理，彰顯了茶廠裡的每日實做，其實就是邊界運作的其中一環，是越南台茶穿越空間與象徵性邊界的關鍵之處。

在越南台茶穿越邊界，進入台灣之前，它們都會面對海關的農藥殘留檢驗；通關之前或之後，許多中下游的買家、盤商，也會要求越南台茶經營者提供農藥殘留檢驗報告。前節所述的品種特性讓越南台茶經營者得以控制農藥使用，但是在面對海關檢驗，或是盤商、消費者時，他們需要的是精細到 ppm 以後的農藥使用管理。面對農藥管理的問題，越南林同的台商們發展出了一大一小兩種不同的解方，確保茶葉產量，並且能順利通過海關。而這一大一小兩種模式，帶出了越南台茶的關鍵要素：大規模生產下的生產模式與勞動力體制。

第一種走的是「大」的路線，也就是早期的越南台茶經營者，在市場與自然環境影響之下，衍伸出的生產模式與勞動力體制。這個所謂的「大」，是相較國內茶產業而言的。在台灣，茶葉一年兩到三獲，除了春、冬茶之外，有些茶區還可以有夏茶產出；茶地絕少超過十甲，勞動力大多透過茶區內的換工，或是委給跨茶區的採茶、製茶班解決，大規模集中生產的茶廠已經寥寥無幾。但是在越南林同省，茶葉一年七季，一次生長季近五十天，幾乎等於全年無休。再者，許多歷史較久的茶廠規模都極大，小則二三十甲，大則超過一百甲，產季時一天必須採收、處理四五噸茶菁。全年無休的茶季和大規模生產，讓越南台商不可能延續國內各茶區的勞動力模式，依靠換工或茶班巡迴採茶、製茶。越南台商得以、也必須維持一個龐大而穩固的勞動力編制。以一間歷史較久、規模龐大的茶廠來說，在逐步機械化之前茶園和茶廠共有三百多名茶工；到了近年，隨著各式機器普及，茶工人數逐步縮減為一百到兩百人。即便如此，越南台茶龐大而穩固的勞動與生產規模，仍然不是國內茶產業可以度量的。

這樣的龐大而穩固的勞動力編制，讓越南台茶在過去二十年內，得以透過台灣茶市中低價端的豐厚利潤，轉化為緊跟各式規範所需的條件。以農藥來說，就



是有幾家茶廠可以聘請專人處理農藥使用的事情，包括台灣乃至幾個潛在出口國的農藥規範更新，以及目前茶園內的農藥管理。2015年，第一次移地研究即將結束，離開茶廠下山的前一天，阿湧丟了一本冊子過來，「這是我們會計整理的，現在台灣的農藥殘留規範，給你們帶回去參考一下」。農藥殘留規範平常當然沒有必要印出來，阿湧讓茶廠會計做一大本、還裝訂成冊，其實就只是想要證明：無論台灣的海關檢藥如何頻繁，農藥殘留標準如何嚴苛，自家當然是有能力緊緊跟上的。安經理經營的茶廠，是台灣某集團在越南的子公司，茶廠裡面的文員，定期會替他更新台灣、乃至其他幾個潛在市場的農藥檢驗規範。安經理讀的是農專，他不僅對越南台茶的農藥管理有信心，甚至反過來認為國內茶的農藥管理更沒保障：

安經理：昨天我才跟全哥在談，說中國市場已經禁止使用 a 跟 b 這兩支農藥，我就說台灣還沒禁，現在我這兩支農藥我現在庫存用完就不用了，全哥那邊也是這樣啊。所以我們反而都是走在前面，那個台灣那邊禁止的、快要禁止的，我們會去了解，甚至我們會去了解這個病害這種蟲害是什麼蟲引起的，要用哪支藥……台灣不是，都是小農，五六支藥給你投下去。

阿元：因為你台灣是小農經營，這邊都是有規模在經營，所以這邊管理者都必須要懂得農藥怎麼使用，怎麼管控，那是第一個保障喔。第二個保障，進台灣還有台灣海關在檢驗，是更安全，那妳台灣哪個單位跟你保證說這山頭一百個茶農，誰去檢驗？沒有嘛。

台灣國內的農藥管理和檢驗情形究竟如何，不是本文的主題，也不會在此深究。但是，對於越南台茶經營者而言，自家更大的生產規模所之撐起更龐大的勞動力編制，以及其中蘊含更多的專業人才，讓越南台茶的農藥管理更加可靠，在面對「食品安全」空間與象徵性邊界時，也能順利穿越邊界。

這樣看來，越南台茶似乎顯得有點財大氣粗——其實不然，龐大而穩固的勞

動力編制只是其中一種經營策略。而這種經營策略面對危機時其實很難進行調整，茶市不佳的時候，維持這麼多雇員就很大的負擔。另外，許多 2000 年以後赴越投資的越南台茶經營者，在土地取得、租用上，往往不如 1990 年代的先行者們順利，自然也無法套用前人的生產模式。因此，越南台茶經營者的另外一種生產模式與勞動力體制，以及相對應的農藥管理，就是走較「小」的路線。

2000 年以後，一方面台灣經營者投資漸趨飽和，另一方面越南當地農民的咖啡種植面積也不斷擴大，晚來的越南台茶經營者的茶地規模往往只有數十甲。這些茶地規模小的越南台茶經營者，除了自家的茶地之外，主要是和越南茶農簽訂契約合約，以取得原料。當然，即便是「小」規模的越南台茶經營者，自家的茶地都是二十甲起跳，算上契約茶地以後，也都有一百甲左右的規模，同樣不是國內茶農可以比擬的。

事實上，很多越南台茶的同行對這種經營方式也多有質疑，對越南茶農並不信任，這些契約的茶廠又是怎麼樣確保品質、確保農藥管理？圖 10 是一個台商準備發給契約的茶農的表格，上面記載了各種農藥在台灣允許的殘留天數和殘留量。這些專攻出口的台商找到了一群非常有力的盟友：農藥經銷商。契約台商會在契約裡面規定，和他合作的農戶必須要跟指定的農藥經銷商購買農藥。此後，台商和經銷商確認不同時節農藥的配方，包括近期的主要病蟲害、天候，特別是降雨情形、採收期與殘留天數。經銷商把藥配好之後，會定期找上這些契約的越南茶農販賣農藥。在這裡，農藥經銷商既是一個中介，在台商與越南茶農之間中介了農藥本身和他的技術；也同時參與了「安全」管理，成為邊界運作的其中一環。



**DANH MỤC THUỐC BẢO VỆ THỰC VẬT
(THEO TIÊU CHUẨN ĐẠI LỢAN)**

STT	TÊN QUỐC TẾ	THỜI	THỜI	STT	TÊN QUỐC TẾ	THỜI	THỜI
		GIẤN (P.P.M)	GIẤN CÁCH LY			GIẤN (P.P.M)	GIẤN CÁCH LY
1	ACETAMIPRO	2.0	18	46	HALFENPROX	2.0	18
2	ACINATRIBIN	2.0	18	47	HALOXYFOP	5.0	18
3	AZOXINIBEN	2.0	18	48	IMIDACLOPRIZOLE	2.0	16
4	IBUPROFEN	2.5	14	49	IMIDACLOPRID	1.0	16
5	IBUPROFEN	1.0	21	50	IMINOCTABINE	1.0	21
6	CARBARYL	2.0	21	51	INOXALIBOS	1.0	21
7	CARBENDAZIM	1.0	21	52	KASUGAMYCIN	0.04	21
8	CARBOFENAN	1.0	21	53	KRESOXIM-METHYL	10.0	21
9	CARTAP	1.0	7	54	LEVUFEN	0.5	21
10	CHENOMETHONAT	0.2	21	55	LIFENURON	5.0	21
11	CHLORANTHANILER	2.0	21	56	METAFENMIZONE	3.0	21
12	CHLORFENAPYR	2.0	21	57	METHIATRITHION	0.5	21
13	CHLORFLUAZON	2.0	21	58	METHOMYL	1.0	21
14	CHLORFENTHAILON	2.0	21	59	METHOXYFENOSIDE	10.0	21
15	CHLORPYRIFOS	2.0	21	60	MEYNYPROS	1.0	8
16	CYHALOTRIBIN	5.0	21	61	MBIBEMECTIN	2.0	8
17	CYHALOTRIBIN	5.0	21	62	NALED	2.0	21
18	CYFLUTHIRIN	5.0	14	63	PARACUAT	0.2	21
19	CYHALOTRIBIN	2.0	14	64	PERMETHRIN	10.0	14
20	CYPRMETHRIN	2.0	11	65	PHOSALONE	5.0	14
21	DEFLAMETHRIN	2.0	12	66	PROPARGITE	2.0	21
22	DEFLAMETHRIN	5.0	21	67	PYRACLOTRIBIN	2.0	21
23	IMAZAZON	5.0	21	68	PYRIDABEN	5.0	14
24	IMAZAZON	2.0	21	69	PYRIMETHIFEN	5.0	21
25	IMAZAZON	5.0	21	70	PYRIFLOXYFEN	1.0	21
26	IMAZAZON	10.0	21	71	QUINALPHOS	2.0	21
27	IMAZAZON	10.0	21	72	ROTENONE	1.0	14
28	IMAZAZON	5.0	21	73	SPINETORAM	1.0	14
29	IMAZAZON	8.0	21	74	SPINOSAD	1.0	14
30	IMAZAZON	0.05	12	75	SPINROZICLOFEN	5.0	14
31	IMAZAZON	1.0	18	76	SPRIFLOTRIN	1.0	21
32	IMAZAZON	20.0	18	77	TETRACONAZOLE	1.0	21
33	IMAZAZON	2.0	21	78	TEBUPENPRAD	2.0	21
34	IMAZAZON	0.3	21	79	TEBUTHIACRIBIN	5.0	21
35	IMAZAZON	0.5	10	80	TETRACONAZOLE	5.0	21
36	IMAZAZON	5.0	21	81	THIAMETHOXAM	1.0	21
37	IMAZAZON	5.0	18	82	TRIFLOPROPRAD	10.0	21
38	IMAZAZON	5.0	21	83	TRIAZINOLIN	0.5	21
39	IMAZAZON	5.0	21	84	TRIAZINOLIN	0.5	21
40	IMAZAZON	5.0	21	85	TRIFLURORFOL	2.0	21
41	IMAZAZON	10.0	21	86	TRIFLURORFOL	20.0	21
42	IMAZAZON	10.0	21	87	TRIFLURORFOL	3.0	21
43	IMAZAZON	5.0	21	88	TRIFLURORFOL	0.05	21
44	IMAZAZON	0.1					

圖 10 準備提供予越南製茶農的農藥使用規範表格。(受訪者提供; 作者攝影)

當然，這些所謂大或小的農藥管理模式，彼此之間也是多有交流。前文提到的施經理和全哥，在訪談開始之前，就蹲在一旁討論當時最新的農藥檢驗規範。而就算是大規模的越南台茶經營者，也是要透過農藥經銷商下單。這些農藥經銷商三不五時就在茶區走動，我唯一一次和農藥經銷商張大哥的接觸，就是在阿伯、阿姨家的餐桌上。張大哥和阿伯一邊扒著飯，一邊聊著附近某位同行最近在農藥上栽了跟頭：為了省錢和越南人買農藥，結果越南人的藥桶沒有洗，運回台灣的時候被海關驗出來；阿伯也說，茶廠裡肥料可以跟越南人買，但農藥攸關身家，絕對只能跟台灣經銷商做生意。這些看似林同省茶區山上的小道消息，其實都在越南台茶經營者的算計，穿越「食品安全」這道空間與象徵性邊界的算計之中。

小結

「毒茶」，也就是食品安全，是越南茶最深重的負面形象，也是第一道必須面對的空間與象徵性邊界。在空間性邊界的層次上，海關執行的農藥殘留檢驗，

一直都是台灣政府標記、拒斥越南茶最主要的手段。在象徵性邊界的層次上，農藥殘留，甚至是落葉劑殘留的指控，則是盤商挑茶首先會考慮的條件，也是國內茶業經營者對越南台茶最普遍的指控。



面對食品安全的邊界運作，越南台茶經營者透過初步浮現的物質性與獨特的生產與勞動力體系，逐漸發展出穿越邊界，維繫事業的本事。金萱的品種特性，讓越南台茶經營者可以酌量、可以更有彈性的使用農藥；而這些酌量、彈性所考量的對象，有時候是農藥檢驗標準，有時候是因為越南台茶被抨擊而緊張的茶市——都是邊界運作的一部份。越南台茶遠大於國內茶產業的生產與勞動力體系，則是越南台茶經營者進一步管理日常實做中的農藥管理的基礎。

在越南茶的案例中，Ryan Galt (2008) 指出的管制風險、市場價值和品種特色都深刻的影響農藥使用的情形，透過龐大而穩固的勞動力編制，或是與農藥經銷商合作，越南台茶經營者們試圖打造和台灣茶一樣安全的越南茶。2016 年 6 月，食藥署的新聞稿指出，在更高的管制風險下，進口茶的農藥殘留超標大約是 2% (食藥署，2016)，相較之下國內農藥殘留超標的比例大概也差不多在 3% 左右 (凍頂工作站等，2015)。不過，「毒茶」只是越南台茶面對的第一道、或許也是最容易穿越的一道空間與象徵性邊界。在第五章，我們將繼續討論圍繞著「爛茶」負面形象所形構的空間與象徵性邊界；同時，在本章初步浮現的物質性，以及越南台茶生產與勞動力體系，也會繼續貫穿本文視野下越南台茶的邊界運作。

第五章 爛茶：物質性、每日實做¹⁴與邊界運作

品質，是我在越南的時候，最常在茶桌上聽的一個詞。在每個調查工作中，隨著人際關係網絡的展開，資料蒐集的深入，所有的物事都圍繞著同一個點展開，無法迴避。在第四章，我們了解到越南茶農們都已經備妥各自的農藥管理之道，穿越農藥管制的國家邊界，以及食品安全的象徵邊界。相較之下，怎麼做出「好茶」才是真正令人頭痛的事情。只有「夠好」的茶葉，才能賣出不虧本的價錢，才能穿越邊界，進入台灣。但是，甚麼才是夠好的茶葉？為甚麼做出夠好的茶葉，能夠讓身在越南的台灣茶農們傷透腦筋？

某天下午，阿伯和阿姨帶我們去拜訪余老闆。余老闆拿出一支據他說是最近價錢最好的茶招待我們，我好奇問到，價錢最好是怎麼說的？余老闆一邊澆著熱水，一邊和我們分享他的生意經：

「越南茶不能隨便賣，一次賣低了之後就會再也起不來。所以，像是在夏秋這種『度小月』的時候，茶價原本就偏低，只能把做最好的拿出來賣，因為其他的會被殺到再也起不來。等到第二年春茶之後，才可以把差一些的茶拿出來賣，而且無論如何都要處理掉，不然就只能做老茶了。」

余老闆說著，阿姨偶爾也接上幾句話，顯然這些和盤商間的刀光劍影，茶農們也都是心有戚戚。我接著問，怎麼樣的茶算是好茶？這其實不是個太明確的問題，但出乎我意料的，余老闆有點無奈、有點戲謔地說，有一次盤商誇他的茶好，

「阿你這樣這個茶，聞起來湯匙要涼涼的，熱熱的人家說不好，沒紅，哈哈哈哈！真的會氣死。聞起來鼻子說熱熱的說沒紅，阿這水就是熱的怎麼會涼？真會氣死！所以說喔，市場小的時候客戶會嫌東嫌西啦；你放著市場開了，又拿那支茶給他，

¹⁴ 本文在此採用「實做」而非「實作」，旨在關注動態的越南茶日常生產過程，如何涉入邊界的穿越或拒斥。如同第五章的內容所要呈現的，為了穿越邊界，越南茶的生產過程必須隨時依照茶葉本身的情況進行調整。為了描述這個動態的生產過程，本文採用較具動詞意味的「做」。

他就說對啦對啦就是要這支啦！其實都是同樣的茶，只是市場問題。」

茶葉發酵程度和味道聞起來是涼是熱有什麼關聯，我也始終想不通。吳老闆講到這些所謂「市場」時充滿了無奈，阿姨在旁邊也是壓根不信。對於市場是什麼、市場要什麼，越南這邊的台灣人也只能不斷調適技術、努力跟上。

這段訪談中近乎閒話家常的對話，呈現了茶農們如何透過品質的每日實做涉入邊界運作。這套邊界是這樣運作的：茶葉品質夠好才能有好價錢，有好價錢才能賣給盤商，賣給盤商才能讓茶穿越邊界，穿越邊界才能換取收入，才能維繫經營，才能繼續下一輪的邊界運作。換言之，品質就是穿越邊界的充要條件之一。自從 Reece Jones (2009a) 提出用「分類」思考邊界的觀點以來，國家邊界與社會建構的差異劃界——也就是本文一再提及的象徵邊界——的關係就一直是政治地理學所關心的議題。在本章，我將試圖說明在每日實做與物質性的觀點下，邊界的穿越與封閉必然模糊的：既是國家、亦是象徵；既是穿越、亦是封閉。在第一節，我們將會回顧「爛茶」負面形象與原料生產的關聯，了解越南茶如何激起封閉邊界的焦慮，由此生成品質的象徵邊界。在第二節，我們將會探究被視為劣次原料生產過程，其背後的勞動力體制與生長環境，如何反過頭來構成越南茶品質實做的基礎。最後，我們將會進入物質性每日實做的層次，觀察茶農與茶葉在發酵過程中的你來我往，理解越南茶如何在前述的基礎之上，進入品質的跨境與排除的體系之中。在第五章，我們將從「爛茶」的負面形象開始，探究製茶本身如何涉入邊界化過程的運作。

5.1 「爛茶」的負面形象

圖 11 是一則 2014 年的新聞截圖。新聞將台灣茶與越南茶並列比較，呈現出前者價格較高、茶湯清澈、品質較好，對照後者價錢較低、茶湯混濁、品質較差的形象。新聞的舉證本身是有問題的，茶湯的清澈與否應當是以透明的茶具對齊光源辨識。但無論如何，這則新聞反映、再製了台灣消費者心目中典型的「爛茶負面形象」：低價爛茶。



圖 11 新聞中的台灣茶與越南茶比較。

圖片來源：東森新聞 CH51（2014）台灣茶混越南茶賣 橙劑污染源恐喝下肚。
影片 1'26''擷取畫面。

「爛茶」負面形象的起源，如同第四章所討論的毒茶，與台灣茶產業轉型後，對於原料生產的需求及想像密不可分。台灣茶產業轉型的過程中，台灣原料茶的生產和來源發生兩項巨大的變革：產銷體系重組與茶區轉移。台灣茶產業的原料出口產銷體系，隨著國內法規修改與全球茶葉市場變遷而面臨調整。在過去，台灣的茶葉會在茶農—茶廠—茶商等不同階段不斷轉手、分級、混合，直到以原料出口的形式離開台灣。但是在 1975 年《茶廠管理條例》廢除之後，茶廠設置門檻大幅降低，茶農們開始涉入製茶程序，轉入高價內銷市場，謀取更高利潤。茶廠林立的結果之一，就是過去的大型茶廠原料來源不再穩定，進而導致原料生產

¹⁵量銳減¹⁶。

台灣原料茶生產的另一個重大變革，就是原料茶區衰退，產量銳減，供不應求。原料出口時代，台灣主要茶區是中北部淺山、丘陵地帶。台灣的原料茶區在 20 世紀中後逐漸休耕、廢耕，甚至轉為都市與工業用地，導致台灣茶葉種植面積與產量持續減少。時至今日，除了南投名間周圍每年仍有約一萬公噸的產量（南投縣政府主計處，2016；台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2017），台灣幾乎已經沒有原料生產。但是在此同時，隨著飲料茶產業迅速成長，台灣對於原料茶的需求卻是不減反增，澆灌了越南台茶發展的土壤。由於產銷體系重組與茶區轉移，台灣的原料茶需求從 20 世紀末開始逐漸由越南茶填補。做為原料生產的越南茶，是台灣茶產業轉型所導致的結果之一，也應當被視為台灣茶產業的一部份。

然而，這個因果關係並沒有被廣泛的認可，大規模、以量制價的生產模式反而成為越南茶「爛茶」汗名的源起。在報章媒體對越南茶的批評中，我們可以發現直接的關聯：

「專家表示，手搖飲料店的茶葉多為低成本、澀味重的「碎形紅茶」，一杯 750CC 成本可能不到 2 元。」（Ettoday 新聞雲，2015/04/23）

報導中的大宗商用茶即為本文所指稱的原料茶。也有一些報導更直接的將成本和品質進行連結：

¹⁵ 本文此處以降的「原料生產」和「原料茶」，均係指越南林同省台灣茶人所生產的烏龍茶。如同本文第三章第一節所提到的，越南進口至台灣各類茶品在台灣茶市普遍被視為低成本、以量制價的食品工業原料。而在烏龍茶廠的生產程序中，依據訂單需求與做工精細程度，可以再細分為「正品」和「飲料茶」兩種產品。然而，即便是精耕細做而來的正品茶，在茶市上的價格和用途，仍然都是以量制價，用以拼配或直接冒充的「原料」。

¹⁶ 根據邱念渠（2005）的說法，《茶廠管理條例》的目的係透過提高茶廠設置的標準，確保台灣整體茶葉品質，維繫出口商譽。在此條例之下，政府對成立茶廠設下較高的資金與設備門檻，也讓茶農們必須將茶菁售予大型茶廠，製作成品質穩定、均一的產品，利於原料出口。該條例於 1975 年廢除後，茶農家戶中的製茶間浮上檯面，影響大型茶廠的茶菁供應。茶農家戶透過將茶菁製為程度不等的粗製茶後，謀取更高利潤；而茶農家戶自行粗製之後，茶商就更難取得品質穩定、成本較低的原料茶來源。

「王昭坤表示，貿易商都以綠茶、紅茶的名義引進東南亞、大陸等地茶葉，包裝成國內知名的阿里山茶、梨山茶等高山茶，而且因綠茶、紅茶進口關稅低，加上產地工資低廉，價格壓到每台斤 800 元以下……茶農說，阿里山高山茶的茶湯喝起來比較順口、喉韻很棒，中國茶、越南茶的茶湯喝起來比較硬，不好吞，香氣也有差別，台灣的茶葉也比較厚。」(謝恩得、陳紹聖，2008/02/24；粗體為作者所加)

當然，並不是所有報導都採取同樣的立場。在少數報導中，呈現出對越南茶品質提升，對台灣茶農更形衝擊的擔憂：

「……在茶樣中摻雜劣質越南茶葉，比賽詐取認證和獎項，讓劣質混茶搖身變為比賽茶……現今越南進口烏龍茶多為台商攜種帶往當地種植，技術日高，產品從外表、質地幾可與台茶亂真……」(高堂堯，2016/06/04)

透過這些報導，我們得以論證，所謂的「爛茶」負面形象，和原料生產密不可分。關於越南茶品質的論述，也並非一面倒的抨擊；例如前文提到 2017 年越南茶於鹿谷茶比賽獲獎的事件，就讓圍繞著產地的品質評判標準遭到質疑。

此外，對越南茶的批評也不只侷限在論述層次。我曾經在某個展場的攤位上，遇到一位致力打造自家茶園品牌形象的國內茶農，是這樣跟我推銷的：「我不能知道他（越南茶）品質是什麼樣子……他們就會進口的東西來混，這樣幾百斤可以做到幾千斤，但是品質我就不敢保證了。」他沒喝過越南茶，也可能喝過卻不知道，但這都不影響他透過樹立越南茶的負面形象，來替產品增值。在我造訪的茶店、茶葉展覽、博覽會的經驗中，這種情況還真不罕見；即便不是對我，也可能是隔壁茶桌飄來的耳語。因此，對前面提到的這位國內茶農——同時也是很多其他同行——而言，挪用越南茶的負面形象，就是在打造「台灣茶農」身分與形象的實做。在針對越南茶的批評中，坐享低成本、高產量的越南茶經營者，顯然可以不必太過在意品質。相對的，高成本、低產量的當代台灣茶農只能、也必然是以

更好的品質相抗衡。透過論述「爛茶」的負面形象，反對越南茶的台灣茶農、茶商由此劃立了一條名為品質的象徵邊界。

然而，究竟甚麼是「爛茶」，甚麼是品質低劣的茶葉，無論是報導或台灣茶農，似乎都沒有辦法清楚的說明。實際上，根據一些投入越南茶產業台灣茶農、茶師的說法，十多年前的越南茶確實品質欠佳，有一股明顯可辨的「越南味」。關於何謂越南味，可以說是眾說紛紜，大體而言就是諸多針對越南茶風味上的批評，從視覺、嗅覺到味覺不一而足。在我的訪問越南茶經營者的經驗中，矢口否認的有之，支吾其辭的有之，能有一套說法的反而最少，而且每套說法的略有出入。甚至，一些稍微年輕一點、或是比較晚去越南的經營者，甚至可能連聽都沒聽過。至於我接觸過的國內茶農，如同上一段提到的，儘管都承認從未喝過越南茶，但卻也無礙他們籠統的批評所謂的越南味。一位曾經待過越南的師傅透露，他之所以離開越南，就是在大約二十年前的時候，遇到無法克服技術障礙，「茶水就是黑黑的，怎麼調整都沒辦法」。阿華老闆，一位在林同經營茶廠的越南華僑，最初是台資茶廠的茶工，後來自立門戶。他認為，當初茶葉會有越南味，是因為當年師傅們還在和越南的環境磨合：

我：台灣這邊除了會說越南這邊農藥有問題，也會講說越南這邊的茶做完以後喝起來會有一股，欸，跟台灣不一樣，越南味什麼的？

華：以前是有，以前做茶是怎麼樣，第一是沒有技術…

練：以前是多以前？

華：欸，五六年前，有地瓜味，茶炒不熟，萎凋不好，變有個越南味，地瓜味，是不是老闆娘？

練：是我們吃的地瓜？

華：對，地瓜葉子的味道。

姨：不是五六年前，是剛開始的時候，剛剛講錯了。

練：所以是剛開始的時候？

華：十年前吼？

姨：十幾年前啦！

華：很多師傅過來不了解這個氣候。

地瓜葉的味道是比較友善的說法，甚至還有茶人告訴我蟑螂屎味的說法—雖然應



該沒有人真正知道蟑螂屎和越南茶的味道究竟像不像。在烏龍茶的製程中，採茶之後依序會有萎凋、靜置、浪菁、炒菁、揉茶等步驟。而阿華所提到的萎凋，是要在茶葉進入靜置發酵之前，降低其中水分。萎凋不足會導致茶葉中殘留水分過多，導致在接下來的靜置階段時，茶葉無法發酵。發酵沒處理好的茶，泡出來就只是葉子水，俗稱「菁味」—或許也就是阿華所謂的地瓜葉味。阿華的答案指明了，十多年前越南茶品質欠佳的原因，是因為技術上還沒有適應當地環境。「越南味」是因為萎凋不足，水分殘餘過多，影響接下來的發酵進程，導致最終無法炒製出理想的風味。「爛茶」並不是因為低成本、原料生產所致¹⁷，也絕對不是不可改變的本質。

「爛茶」和「越南味」不僅不是不可改變的本質，更可能是因人而異的身體感官經驗。即便如「菁味」已經是個在台灣茶藝界普遍使用的味覺描述，依然缺乏明確的感官判准，讓交易雙方有大量品味論述、討價還價的空間。這反映在阿華和阿姨對於越南味出現時間點的對話，即便是關係密切的兩位越南台茶經營者，對於品質磨合的進程、對於品味論述的採納，都有不同的說法。再扣連到本章開頭處，吳老闆將越南台茶的品質定義為台灣茶市的延伸的說法，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將越南味理解為盤商和經營者不斷討價還價出來的品味論述與品質實做。

越南味的故事反映了源自低成本、大規模、原料生產的「爛茶」負面形象實際上並不正確。做為原料生產的越南茶，仍然可以在品質上有所精進。於是乎，新的問題浮現了：作為原料生產的越南茶，究竟如何在品質上有所精進？台灣茶農們如何和越南的人與環境磨合，做出余老闆所謂夠好、「度小月」的時節也能拿的出手的好茶？甚至，台灣茶農們如何在越南重新理解並實踐到底甚麼是「好茶」，從而得以穿越品質的象徵邊界，進入台灣？實際上，阿華對於越南味的說法已經給了我們足夠的指引，那就是：回到製茶的勞動過程。

¹⁷ 關於越南茶和台灣茶風味上的差異，還有另一個說法，認為是因為產地、風土影響了茶葉的味道。關於這部分的分析，請見第六章關於農業本土論述的內容。

5.2 大規模生產

在第四章，我們曾經討論過越南茶的大規模生產如何有助於農藥管理。部分茶農在自然環境和市場交互作用下，衍伸出的龐大而穩定的生產與勞動力體制，使其得以在過去二十年迅速累積經濟資本，並且不斷緊跟著台灣的各種農藥規範，進入台灣，同時穿越安全的象徵邊界。但是在第四章，我們只說明了越南茶廠如何得以維繫龐大而穩固的勞動力體制，並沒有說明越南茶廠如何確保龐大而穩固的勞動力體制如何有效的運作。而論證越南茶廠如何確保勞動力有效的運作，也將讓我們更進一步理解越南茶關於品質的實做。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我們提到，並非所有茶廠都採取前述模式進行農場管理；但是進入製茶階段後，每一間茶廠—至少我訪談過的十餘間茶廠—都是採取這個龐大而穩定的生產與勞動力體制。這反映了台灣經營者們普遍希望透過降低越南茶工的流動率，確保茶葉品質的穩定。但現實的情況是，林同省的台資茶廠普遍困擾於越南茶工的流動率，以及工作狀態的不穩定。受限於語言和身分，本研究無法深入茶工之間蒐集資料，自然無法從茶工的觀點進行分析。因此，接下來，本文將試圖解釋勞動力體制以及勞動情形的不穩定，如何可能威脅到越南茶的邊界穿越，造成台灣雇主與越南茶工之間的緊張關係。

勞動情形的不穩定，幾乎困擾了林同省所有台資茶廠。說白話一點，就是台灣雇主們認為，越南茶工一有機會就會偷懶、偷工減料，除草的動作慢吞吞、肥料或農藥組發生過監守自盜，組長把農藥兌水賣掉、秤重給薪的採茶組一心三四五六葉連枝帶幹折下來、萎凋靜置浪菁的時候動作慢吞吞，誤了發酵的時間、炒菁沒炒熟或炒焦、揉茶揉不圓……我接觸的每一個受訪者，在每一個製程都有可以大吐苦水的事情。如同在本章一開始所說的，不夠好的茶根本賣不掉；甚至稍有不慎，還會做出前一節所說的越南味。勞動情形的不穩定，意味著可能更難以穿越邊界，如此一來自然讓身在越南的台灣茶農們跳腳。在這裡面，有一點讓我

格外注意，就是關於「監守自盜型不穩定」的抱怨多在講陳年往事，「做茶不力型不穩定」則都是在講最近的事情。

為了減少這些勞動情形的不穩定，各家茶廠普遍都會混用包工與月薪工，並且發展出截然不同的管理方式。包工主要是在技術相對較低、工作分量彈性相對較高的農場管理，例如鋤草、澆水¹⁸；月薪工則是在茶廠裡面，技術要求較高，工作密度也較強的部份。在茶園管理的部分，台灣茶農們更傾向採取包工制確保茶園管理所需的大量低技術、低密度勞動力。在阿伯和阿姨的茶廠中，除草是按面積給薪、採茶是按茶菁重量給薪，不然就會發生所謂的勞動情形不穩定：「算天的沒辦法，慢慢來，吼，你看的你就會，搖頭啦！之前除草請工的……一公頃做一個月還沒除好啦！我說我這樣子一百公頃全部都是這樣怎麼辦！」。

勞動情形不穩定也不是只有偷懶這麼單純，真正讓台灣茶農頭痛的是當地勞動力短缺的情形。茶園管理所雇傭的包工，都是各茶園周圍京族居民。當地京族居民的主要經濟活動是各家戶農場的咖啡種植，因此到了咖啡產季時，台資茶廠的農場管理都會有程度不等的勞動力短缺情形。對此，有的茶廠用更高的薪水，甚至專門雇用一組外地的月薪工來度過咖啡季。

茶園管理如此，到了茶廠內的製茶部分，台灣茶農們對於勞動力穩固有著更高的要求：每一間台資茶廠的製茶工都是以月薪工為主。阿伯和阿姨的茶廠在逐步機械化之前，最高曾有三百多名茶工。各台資茶廠都必須、實際上也有能力配置的大量月薪工。這樣的勞動力配置看似解決了勞動力短缺的苦惱，穩定而長期的生產也讓越南茶有更多試誤的空間可以跟上台灣盤商的標準。但是，如果說包工制以及計件計重的搭配就足以解決茶園裡的偷懶問題，在更加複雜、充滿各種細微操作的茶廠裡，又要如何確保勞動情形的穩定？接下來，我們透過一段我在

¹⁸ 在我進行參與觀察的茶廠裡面，因為茶地面積較大，可以讓茶樹輪流休養生息，因此鋤草、澆水等工作的分量就是要視不同時期而定。甚至在 2015 年以後，因為茶市慘淡，許多台灣茶農會直接放棄一部份茶地，降低開銷。

茶廠裡觀察到的製茶過程插曲，說明茶廠的製茶與品質控制實做，如牽涉到穿越邊界的可能，牽涉到邊界化過程的運作。同時，正是因為製茶與品質控制實做攸關邊界化過程，台灣雇主與越南茶工之間的緊張關係也可以從中得到解釋。

揉捻成形是台灣球狀烏龍品質的另一個關鍵，其重要之處有二：首先，在揉捻的過程中，茶葉內的細胞壁會被破壞，其中的香氛物質能夠更順利溶入茶湯，有助於沖泡時的嗅覺、味覺呈現。第二，揉捻成完整的球狀可以減少運送過程中的損耗。揉捻成型除了最傳統的純手工，最常使用的機器是結合人力與機械油壓旋轉、擠壓的「蓮花機」(圖 12)；以及近年從中國進口，據說最初是用來將廢鐵擠壓成塊的「豆腐機」(圖 13)。蓮花機揉捻出來的茶乾形狀完整，價格較高，但因為人力需求較大而為茶工們所不喜。揉茶工需要將數十個布團裡的茶葉，結合機器用力擰壓二三十次不等。在使用蓮花機時，台灣茶農或監工也很難管理茶工，因為操作蓮花機不只是單純的啟動機器，更關乎茶工有沒有用力擰壓，知不知道如何用力擰壓。相較之下，豆腐機的人工需求較少，茶工們只要把茶乾倒入機器，啟動開關；但是每次操作之後，仍然需要動手翻攪，將被壓成一團的茶乾「解塊」，避免結成茶丸(圖 14)。



圖 12 蓮花機。蓮花機每一次揉壓都需要茶工傾盡全力，而每一批茶葉都需要被揉壓二十到三十次。（作者攝影）



圖 13 豆腐機，圖中的工人正在將剛壓完一次的茶葉解塊。豆腐機較蓮花機節省力氣和人工，但因為成品賣象較差，故通常用於價值較低的飲料茶原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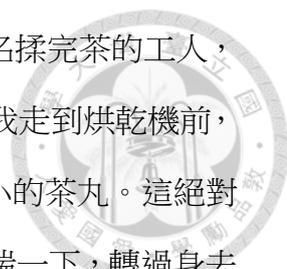
(作者攝影)



圖 14 茶丸。(作者攝影)

茶丸，就是台灣球狀烏龍最大的忌諱之一。茶丸是指多片茶葉在揉捻成形的過程中，因為沒有妥善的解塊，而結成一球。不只外觀醜陋，也會因為沖泡時葉片難以舒展而影響風味。阿姨和阿湧都經常在拿到茶樣之後抱怨，「明明前面發酵、炒茶都做得不錯，但是偏偏沒有揉好……」。不常待在越南的阿勇也告訴我，他只要來越南幫忙就是去緊盯著茶工，特別是揉茶的，「你要他們揉 30 次，他們就會殺到 25 次；你要他們揉 25 次，他們就會偷到 20 次。而且你一沒盯著，他們又鬆掉了」。為了確保揉捻成形的品質，揉茶組是整個茶園、茶廠中，唯一按批¹⁹計薪，而且有扣薪機制的工作隊。每一批茶做完後，工頭都會送一小包茶樣到老闆桌上，不只是讓老闆測試這批茶的味道，更是要讓老闆檢查是否有妥善的揉捻成形。茶丸太多的時候，每個茶工在這批茶的薪水會被打六折。但是，扣薪的標準是什麼？怎麼樣算是「嚴重」的結成茶丸？每批上噸的產品，要如何檢查？茶廠裡品質管控的日常實做中，究竟是如何處理，或甚至是無法處理揉茶這件事？

¹⁹ 此處的「批」，指的是同一天、進行同一種製程茶菁。我最多曾經看過一天兩批，前半夜做一批原料茶，後半夜做一批較精緻沖泡茶。



某天，茶廠的製程已經到了最後階段，茶廠裡只剩下剛兩名揉完茶的工人，一邊掃地，一邊嬉笑怒罵，等待最後烘乾完畢就可以包裝入庫。我走到烘乾機前，和以往一樣隨意翻攪，卻被我翻出圖 14 裡那顆五十元銅板大小的茶丸。這絕對是非常嚴重的製程紕漏。我抬起頭，兩名茶工尷尬的大氣不敢喘一下，轉過身去忙別的事情。當然，茶都已經做完了，早就沒有別的事情了。茶廠裡的氣氛瞬間凝結。我告訴我自己，不可能，做成這樣的茶乾，不可能賣的回台灣。在那一瞬間，邊界穿越的焦慮向我襲來，旋即又朝越南茶工轉嫁而去。我做為沒有領受薪水、毫不相干的旁觀者，也在撈出茶丸的短短一瞬間，感受到品質的象徵邊界對台灣茶農們而言是多麼沉重的壓力，感受到台灣茶農們如何根據邊界穿越的經驗，感知茶的品質。然後，也在短短一瞬間成為邊界化過程的中介，將穿越邊界的焦慮轉嫁到越南茶工身上——一如其他台灣雇主所做的事：在茶廠裡盯梢，拔擢工頭進行監督，或是扣薪。茶工和我身上一瞬間橫掃而過的心靈風暴，都是源自於對邊界穿越的焦慮。揉茶組的扣薪制，與其說是對茶工的懲罰，不如說是降低這批茶乾的成本。如同本章一開始，吳老闆所說的，總是有些茶會做的比較差，還是要面對它們不太可能再做為一般的產品、以一般的價格售出的事實。因此，揉茶的好壞、扣薪的判準，根本不存在明確的、標準化的判斷依據。一切歸由台灣茶農判斷，這批茶究竟能以什麼樣的價格賣出。當盤商用模糊的品質標準要求台灣茶農時，台灣茶農也用模糊的品質標準要求越南茶工。

因此，茶廠裡的品質管控，實際上是一個人身控制薄弱的勞動力體制每日實做過程。我無從探究人身控制薄弱的情形與程度，但無論如何，茶廠的品質管控依然健在，人身控制薄弱已經是勞動力體制與品質管控的其中一部份。在大規模生產的體制下，台灣茶農追求的是多數產品的品質穩定。若有做出哪一批令人驚艷的好茶，那是難以複製的意外之喜；重要的是，要確保沒有哪一批茶過分糟糕。一位台灣茶農直接告訴我，越南茶沒那個成本做好，砸錢下去盤商也不會買單；越南茶就是以量制價，確保每一批茶都是安全也有一定品質。台灣烏龍茶無法標

標準化的品質，讓盤商與台灣茶農、台灣茶農與越南茶工之間協商何謂品質時，只能模糊的、動態的、每日視情況而定的進行實做。

當下台灣雇主與越南茶工之間的緊張關係，實際上就是對於邊界穿越的焦慮的體現；隨著品質的象徵邊界對越南茶日益嚴苛，這組緊張關係只會同樣日益嚴苛。如同第三章提到的，在最缺茶的 2000 年前後，無論國內或越南茶只要能喝就有人收；也因此，如同前面提到的，「監守自盜形不穩定」的抱怨多在講陳年往事，「做茶不力形不穩定」則都是在講最近的事情。偷懶，或說勞動情形的不穩定，真真切切的是茶廠每日實做的一部份；但是定義、並且試圖消滅勞動情形不穩定，則是因為要穿越品質的象徵邊界的壓力。

透過品質管控的每日實做，越南茶即便難臻極品，至少也堪堪足以企及台灣的標準，說服盤商下訂，跨境而來。品質管控的每日實做，大至勞動力體制，小至茶工的一舉一動，都是邊界化過程的其中一個環節，都是越南茶要跨境而來不可或缺、不可忽視的一部份。透過品質管控的每日實做，邊界化過程最終逐步進入到台灣茶農與越南茶工的身體上運作。跨境與劃界的張力，也伴隨邊界化過程到來，並且轉化為台灣茶農與越南茶工之間的緊張關係。在我們探究越南茶如何在大規模生產的勞動力體系下，進行品質的日常管控之後，我們將進入到第五章的最後一個問題：何謂好茶？

5.3 添入物質性的日常實做

「何謂好茶」這個問題，其實涵蓋了三個本節要嘗試回答的問題。首先，承襲前一節不斷提到的，何謂台灣烏龍茶無法標準化的品質？其次，身在越南的台灣茶農們如何理解與實踐品質，說得出也做得出「好茶」？最後，透過本文的物質性每日實做觀點，可以如何理解茶過程？接下來，我們將進入茶葉本身的討論，透過「發酵」這件事，理解人與物質性的互動，實際上是前兩節所有圍繞著品質的跨界與分化的基礎，在台灣烏龍茶不穩定的物質性下，徹底重構邊界化過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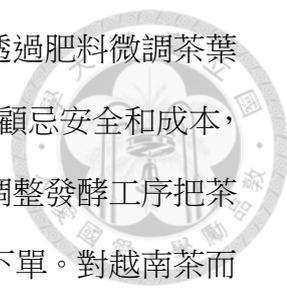
運作。

製茶是一個很不穩固的網絡。茶葉的品種，生長環境的日照、雨水、濕度與土壤，施肥與用藥，蟲害的嚴重程度，茶菁採摘當日的溫溼度，更不用說茶廠內的大小事，所有茶農都會告訴你，茶葉的品質就是這麼複雜。而這一切林林總總難以掌握的因素，最後會在處理發酵的時候，一股腦的讓茶人們焦頭爛額。在這個充滿諸多物質性的不穩定、幾乎無法複製過去經驗的網絡中，茶農們最終只能依據盤商開出的價碼理解台灣茶市的流行風味，從而實做品質——儘管可能和台灣茶農們心目中的品質相去甚遠。換言之，每一批茶葉從種植到製作，都是一次邊界化過程的具體運作。

對茶農而言，決定品質最關鍵之所在，莫過於發酵。誠然，茶園裡的下肥料、噴農藥，乃至於發酵前後的萎凋與揉茶，都是十分重要的環節；但是這些階段得小心翼翼，大抵都是為了在茶葉在發酵時能有更好的表現。如同前面提過的，處理發酵時如果稍有不慎，或是對茶葉的掌握度不足，就很有可能出現像是過去「越南味」的情況。但是，對越南茶而言，什麼才能稱得上是發酵的好？

實際上，發酵的複雜多變，就是讓「何謂好茶」這個問題更加難以回答的其中一個原因。台灣所做的烏龍茶，以發酵程度來區分的話是半發酵茶，介於全發酵茶（例如紅茶）與未發酵茶（綠茶）。換句話說，發酵的程度與做法更像是一個光譜，端看茶人如何拿捏火候。如果說前一節的揉茶成形還有一些判准，發酵的技藝甚至是有好幾種不同的做法，端看茶市當時的流行而定。例如，台灣烏龍茶市最近流行輕發酵，茶湯幾近綠色，勝在清香撲鼻；但是對老一輩喝習慣重發酵、重烘焙的茶人與消費者來說，這些輕發酵烏龍味覺表現太清淡了（余舜德 2013）。甚至還有受訪者告訴我，

「茶乾做出來都快變黑色了，怎麼可能泡出來是綠的？後來有人跟我推銷我才知道，可以加藥讓茶變綠！」



「加藥」聽起來是非常嚴厲的指控，但受訪者指的，應該只是透過肥料微調茶葉中的生物化學物質來改變茶色。這位受訪者後來告訴我，雖然他顧忌安全和成本，沒有買這支據說可以讓茶變綠的農藥或肥料，但還是必須透過調整發酵工序把茶做綠。畢竟，台灣流行的就是輕發酵，盤商試到夠綠的茶才會下單。對越南茶而言，所謂好的發酵或好的品質，其實就是做的夠不夠像台灣茶——實際上，也就是本章開頭引述余老闆所說的市場。如同我們會在第六章仔細討論的，越南茶進入台灣以後，或打上國內產地的招牌販售，或和國內茶葉拼配，因此做的夠像台灣茶，夠像台灣當時流行的口味，其實就是越南茶品質之所在。至此，我們可以將品質的邊界運作的流程補充得更具體一些：越南茶要做的夠像台灣茶當時流行的口味，能和台灣茶拼配（或乾脆冒充），盤商才會買單；盤商買單，越南茶才能穿越邊界，進入台灣；但也正是因為越南茶和台灣茶如此相似，並且跨境而來，也才會激起更激烈的劃界焦慮，最終試圖將越南茶排除在外。

如同 Corey Johnson 和 Reece Jones（2014）的觀點，邊界化過程必然有其發生在日常生活的那一側。本研究專注在越南茶，所以可能沒有充足的資料可以說明台灣茶到底流行哪些口味。但是茶農們如何透過品質管控的每日實踐，確保其茶葉能夠穿越邊境，卻是要理解本文所謂的邊界化過程不可迴避的問題。接下來，我們將試圖要更進一步窮盡發酵這件事情，以前節提到的勞動力體制為基礎，探究茶葉與市場如何共同形構越南茶的邊界化過程。

在余舜德（2013）筆下的台灣烏龍茶，是一門難以徹底採行工業化、科學化標準的技術與生產模式。難以捉摸的發酵程度、「看天做茶」和「看茶做茶」的物質性（原文做物性，materiality）讓茶人即便使用現代化的製茶機械，也仍然無法割捨傳統的身體技藝。身體的感官，嗅覺、觸覺、視覺、聽覺，仍然指引茶人如何與茶葉、與現代科技共謀。根據余舜德的說法，他的田野所在的台灣凍頂茶區仍然保有小型家庭作坊，以家庭為單位世代相傳的特色。那麼，在越南茶的案例中，物質性如何與大規模、工業化的原料生產體制，生產出符合市場——通常以

盤商為代表—想像的滋味？

圖 15 裡面，是一位越南工頭和三台浪菁的機器，那天晚上在機器裡翻滾的是要做成「紅烏龍」的茶菁。對茶農而言，紅烏龍是一種台灣近年流行的夏季替代收入。夏天的時候，因為高溫和充足的日照，茶樹生長較快，茶葉較薄，高蒸發散讓更多的茶多酚（Tea Polyphenol）物質堆積在茶葉裡面；而林同省茶區，尤其是海拔較低的寶路一帶，恰好符合上述「理論上」的環境條件。對台灣部分發酵的烏龍茶而言，太多的茶多酚物質會讓茶葉苦澀；相對的，做成全發酵的話，茶多酚物質會氧化成為帶有甜香味的生物化學物質。除此之外，夏天較薄的茶葉也可以更快、更好控制的達到茶人所想要的發酵程度。因此，紅烏龍越來越常見於每年夏天的台灣茶市，也受到越來越多消費者青睞。然後，就像前面描述的邊界運作方式，越南這邊的台灣人也開始試著做紅烏龍了；當然，他們不單單只是著眼於銷路，亦有環境、茶樹生長上的考量。



圖 15 越南工頭，以及他所負責的三台浪菁機。（作者攝影）

但是，2016 年 7 月的這個晚上，茶葉的物質性卻完全不是前段所描述「夏天的茶葉」的模樣。阿姨和他的茶工們發現，理應大而薄的茶葉卻還是偏厚。按照台灣傳來的做工，很可能會發酵不足，難以做出台灣紅烏龍要的紅色茶湯、香

甜口感。當天晚上工頭的工作，就是操作這些機器來掌握發酵程度；但是如同余舜德描述的，操控機器絕對不只是透過儀表板調整時間、速度或溫度。浪菁機可以透過滾動，來促進茶菁的發酵程度。那天收了二十個布袋的茶，一個布袋 60 公斤，其他茶工四人一組，將萎凋完的茶菁送入滾筒（圖 16）。由於這幾台浪菁機是老舊的機型，再加上二十個布袋裡的份量難免有高有低，因此滾筒裡面放入太多茶菁的時候，就會導致轉動的速度不一樣。對於大量生產的越南茶而言，品質管控的前提是品質一致，同一批茶葉發酵進度參差不齊的話，接下來的製作可就麻煩了一更何況，紅烏龍的重點就是攪拌、發酵。再加上格外厚實的茶菁，讓茶廠。這個晚上，工頭的工作就是要去觀察每一批送入滾筒裡的茶菁的份量，以及滾筒運轉時的速度，調整機器的轉動速度和時間。



圖 16 搬運茶袋、並起將茶菁送入機器中的茶工。（作者拍攝）

除了機器，越南茶品質管控的每日實踐有時候也會透過純手工來進行。離開滾筒以後，阿姨和工頭時不時把每一袋茶葉打開來檢查的發酵程度。根據茶改場和農委會的說法，紅烏龍「加工製程簡易，不必熬夜製茶」（吳聲舜，2012），但是阿姨的這批紅烏龍做到第三天，才覺得發酵程度夠了，和台灣茶夠像，賣得出去，能回台灣。最後在試茶的時候，阿姨對這支紅烏龍滿意的不得了，不僅發酵

夠，茶湯紅，滋味甜，原本帶來大麻煩厚實茶葉，最終竟然讓這支茶一路沖到第六泡。

越南茶的每日實做必然要從物質性的觀點出發。余舜德（2013）認為，是部分發酵茶複雜、高度身體化的物質性，讓茶改場介入下更科學、更工業化的烏龍茶技術，仍然與身體、與過去的製茶技藝密不可分。也正是因為同一個理由，讓越南茶的邊界運作更加複雜。這就是越南茶品質管控的每日實踐，也是邊界運作的其中一個環節：不同於透過論述或實踐爛茶的負面形象來封閉象徵性邊界，而是透過物質性的每日實踐來證實品質的象徵性邊界同樣可以被穿越。

小結

在本章前面的篇幅裡，我們沿著以下的路徑，回答了一系列關於品質與越南茶的問題：越南茶之所以被視為品質不佳的列次品，和其作為台灣原料生產的替代有關。然而，作為原料生產的替代並不等於忽視品質，茶農們在過去二十餘年不斷的和人與環境磨合，緊追台灣茶產業的品質標準。而這個磨合和緊追的基礎，就是建立在龐大而穩固的勞動力體制，以及長而多產的種植環境——也就是，原料生產的勞動力體制與環境本身。在這個人身控制薄弱的勞動力體制下，台灣雇主與越南茶工共同在邊界穿越的焦慮與張力下實踐出越南茶的品質。

最後，我們從邊界化過程的觀點，重新理解品質與品質的實踐。在國家邊界南以阻絕越南茶的情況下，品質的論述與批評成實際上是國內茶農、茶商象徵邊界劃立的其中一個部分。「爛茶」的負面形象讓中介台灣茶市與越南茶經營者的盤商，得以將台灣茶市的口味定義為品質的標準，要求越南茶緊跟腳步，越做越像台灣茶。前述的過程同時也是物質性的，部分發酵茶難以捉摸的發酵、氧化過程，讓品質界定的過程缺乏一目瞭然的判準，始終變動不定，並且體現在勞資關係的張力中。最終，茶葉的物質性一方面強化了品質的象徵邊界，讓越南茶更加難以穿越邊界；但另一方面，茶葉的物質性，以及圍繞著物質性的勞動力每日實

做，卻讓越南茶能夠觸碰到捉摸不定的品質標準，從而得以穿越邊界，進入台灣。

在第五章中，我們看似描繪出了一個憑藉龐大的土地與勞動力，能夠承受試誤的成本，在不斷嘗試中找尋穿越邊界之機，即便傾國內茶人之力也難以撼動的越南茶圖象。林同省的台灣茶人不僅如第四章所述，進行更有利的農藥管理；更進一步的，他們也在品質上取得突破，出入台灣茶葉比賽，挑戰本土化台灣茶產業的邊界運作。但是，果真如此嗎？如前所述，越南茶在進入台灣之後，主要用於和國內茶拼配的原料，或是直接打上台灣的商標出售，從未浮出水面過。而正是因為拼配和混充之間的曖昧不明，讓越南茶陷入難以扭轉的危機。實際的情況是，林同省的台商正在凋零，在我蒐集資料的兩年間，至少就有三家接觸過的台資茶廠轉售。在第六章，我們將會討論「拼配」這門台灣茶產業的百年技術在當代如何與越南茶一同遭到貶抑，並且由此重新思考何謂本土化台灣茶產業的「本土」。

第六章 混茶：多重邊界的疊合

時至今日的台灣茶，是一個強調本土、產地與純粹的純化（purify）商品。如同我們在第三章第一節提到的，1980 年代以後，無論是高單價的高山茶，或是低單價的飲料茶，都一步步被打造為台灣本土性的象徵。前者是台灣代表性的精緻飲料文化，後者則是立基於前者，並且已經輸出到全球市場的大眾流行文化。從原產地標示，到更小尺度的產地認證，一系列農業政策反映了不同層級的政府對純化台茶的支持。在銷售端，茶行、盤商依據產地和海拔區分產品價格的行為，則說明了純化台茶不只是政府單方的作為，更是台灣茶產業現存、實際運作中的價值排序體系。

每年秋天在南投中興新村舉辦的「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以下簡稱茶博），是台灣規模數一數二、每年吸引五十萬人次入場的茶界商展²⁰，其中就可以觀察到純化台茶的再現與強化。儘管最近幾屆的茶博都設有「國際茶席區」的展場，邀請世界各國的茶人在此展演風格迥異的茶飲文化，茶博最具代表性的重頭戲，仍然是戶外數百個來自全台各地的茶商、茶農攤販。這些攤販的招牌、背景除了寫上自家名號、掛上茶比賽得獎匾額，更要報上茶區所在，無一不是台灣各個知名高山茶區。但是，對賣茶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向來來往往的訪客「論述」這些名號與招牌。一位來自南投山區，自家品牌剛起步的第二代茶農，是這樣試圖說服我選擇他的產品的：

「我不能知道他（越南茶）品質是什麼樣子……今天有多少就做多少，今年有六十斤，就只賣六十斤，賣完就沒了……但是其他人不一樣，他們就會進口的東西來混，這樣幾百斤可以做到幾千斤，但是品質我就不敢保證了。」

這位受訪者來自一個規模較小的茶區，為了確保匿名，我無法給予更多關於受訪

²⁰ 2017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取自 <http://teaexpo.mmweb.tw/?ptype=info>（last accessed: 2017/12/19）

者身分背景的描繪。透過抨擊越南台茶，以及使用越南台茶的方式，從而證成自家產品的安全、精緻或誠實，在台灣的茶行、茶展並不少見。無論自產自銷、本土生產、茶比賽名次或農藥檢驗報告多有說服力，一旦沒辦法自證絕無「混茶」，那就沒辦法自證本土與純粹，那麼也就無法自證任何安全與品質。

但是「混茶」的負面形象，除了質疑不誠實的使用越南台茶，也同時挑戰了廣泛運用於全球茶產業的「拼配」技術。2015 年秋天，當時我剛開始投入越南台茶的研究，在同做茶葉研究的學長牽線下，來到大稻埕一家老茶行進行訪談。原訂要同行的老師臨時有事，真正有門路的學長遲到，我的訪談技巧尚十分生澀，更別說當時飲料茶食安事件風聲鶴唳——我幾乎把好不容易牽到的線斷了。茶行老闆原本在倉庫裡面忙碌，被我的來訪打斷工作。他看我結結巴巴、緊張得滿頭大汗，不耐地把訪綱拿去，看到上面寫著「拼配」兩個字，突然畫匣子大開，「你把錄音筆關掉好不好，我跟你說一些真正的事情！」原本在旁邊分裝茶葉的老闆娘和女兒也圍了上來。老闆一家說的義憤填膺，「媒體都說是混，拼配這個你一定要寫清楚，不是外面他們罵的那樣！」。對茶行業者而言，拼配是台灣茶產業百年來的技術傳承，甚至是走向全球茶市的關鍵技術、「know-how」。混茶的負面形象，在批判不誠實行為之餘，也會動搖拼配這項技術傳承，將台灣茶產業自絕於茶葉的全球農食體系之外。

正是因為本土、純粹的象徵之於台灣茶產業至關重要，拼配與混茶之間的含糊曖昧，也就成為三個負面形象中最具爭議性的議題。混茶，乍看之下是越南台茶的三個負面形象之一，實際上可能更像是集前二者之大成：正因為越南茶可能又毒又爛，所以才會有以次充好之嫌。如同「毒茶」與「混茶」反映了台灣茶產業複雜的食品安全或品質體系，「混茶」同樣彰顯一個台灣茶產業轉型以來的核心辯論：台灣茶能否繼續採行拼配，抑或是必須落實單一產地、茶園為產銷單位，成為純粹而本土的象徵？在第六章，我們首先要釐清「混茶」負面形象的內涵，以及拼配技術在台灣茶產業的脈絡與位置，最後透過兩者間的張力，探討全球農

食體系與在地轉向碰撞下的農業本土劃界。



6.1 「混茶」的負面形象

目前所能追溯到最早的「混茶」負面形象文本，是 2000 年時的一則報導提到，在象徵台灣茶藝最高水準的茶比賽中，有些「不肖茶商」混用越南茶詐取獎項：

「林能德說，連日來他也接獲消息，指有越南茶、印尼茶，甚至中國大陸茶混入參賽，但依茶賽規定，新品種組不限產地，僅限制合作社會員與鹿谷鄉茶農才可參加。」(陳紹聖、簡獻宗，2000/12/05)

由於東南亞各地的烏龍茶多有台灣茶農投入轉移，越南台茶經營者之間本就不乏國內茶農、師傅，當然也包括鹿谷。台灣茶比賽中出現越南台茶，並且外觀、品質難辨，甚至得獎，並不是單獨案例。2017 年亦有茶農使用越南台茶，獲取茶比賽而遭人檢舉的新聞：

「賴姓茶農三年前進口九千斤越南茶，再以人頭報名參加鹿谷鄉凍頂茶葉合作社一〇四年冬茶比賽，結果有近五百斤獲獎，一斤三百六十元越南茶成為比賽茶後價格暴漲，最高賣到每斤二千八百元」(張家樂等，2017/06/14)

各個茶比賽的規則各有不同，一般而言用「版」來做單位，一版需繳交報名費與 10~20 斤茶葉以供比賽樣茶、農藥殘留檢驗與農會購買。多數茶比賽受件時只認報名茶農身分，難以透過外觀區辨產地。因此，購入外地茶葉，增加版數提升入選、得獎機率，就成了各地茶比賽公開的秘密。

不只在茶比賽，一般的沖泡茶消費中，使用越南台茶拼配，以擴大產量、降低成本，也是屢見不鮮。一則 2005 年的新聞報導中，描述了越南台茶如何「成為」本土烏龍茶：

「台灣茶園約兩萬公頃，年產量約兩萬噸，難以滿足市場需求，每年要從外國進

口茶葉兩萬公噸。邱垂豐說，目前沒有正式統計高山茶所占比率，但粗估約七千噸，占總產量三分之一，由於供不應求，致黑心貨充斥。不肖茶商詐騙手法，包括把品質好與不好的高山茶混在一起，或混入一般低海拔茶葉，另有用大陸或越南高山茶混充。」(張柏福，2005/07/10)



「混茶」最直觀的形象，就是不誠實的混用茶葉原料，其目的大多是為了壓低成本，增加產量：

「20多名茶農昨天開會，鄉代吳金樹說，名間鄉的茶園大都要買水灌溉，灌溉水1噸13元，另外肥料、農藥也都要花錢，加上製茶的工資，1斤春茶至少要賣600元才夠本。今年越南、大陸茶葉大量湧入傳統市場，1斤春茶只賣300元，讓茶農跳腳。」(張家樂、陳紹聖，2007/04/12)

報導中提到的南投縣名間鄉，是台灣烏龍茶種植規模最大的茶區。在近年以海拔為核心的台灣烏龍茶價值排序裡面，名間茶區海拔較低，因此才有一斤600元的低價——也因此，當更低價的越南台茶大舉越界而來時，在台灣茶產業中定位最接近的低海拔茶區首當其衝。2007年四月，1000多名低海拔茶區茶農以及議員、立委赴立法院陳情(莊芳銘，2007/04/20)。從此以後，台灣低海拔茶葉產區的茶農、茶商與地方政治人物，就成了論述越南台茶負面形象，反對越南台茶進口的中堅力量。

對越南台茶的反對者而言，不誠實的混用茶葉原料，除了壓低茶價以外，也會導致食品安全與品質的疑慮。本章開頭處，南投第二代高山茶農對越南台茶的質疑，就是擔心混用之後，可能危及國內茶的品質。若越南台茶在海關時即被驗出農藥殘留超標，會立即銷毀或退櫃，問題較為單純。但是當已經製成上市的產品發生爭議時，如何究責就成了大問題——或是說，根本無法解決的問題。2009年，故宮博物院所販售的烏龍茶被驗出農藥殘留超標。供應商的茶葉原料來源包括國內與越南台茶，但名間鄉農會則表示沒有茶農、茶廠供應茶葉予該供應商，

意指農藥殘留超標的產品是因為混用、甚至就是越南台茶(江良誠等,2009/11/17)。2015年的飲料茶農藥殘留超標也是相同的情況,以至於無法確定不合格茶葉的來源。「混茶」讓國內與越南台茶之間的爭議難以究責。



台灣茶產業本土化的基礎,在於安全與品質上更為優越的形象,使其足以成為浮現中的農業本土象徵。而這個本土象徵,在「不誠實的使用茶葉原料」導致的難以究責下,遭受挑戰,發生農業本土的危機。因此,如何究責、如何區辨,如何重新劃定空間與象徵性邊界,成為國內茶業經營者的當務之急。「混茶」的負面形象,就是國內茶業經營者具體作為。當一個茶農或茶商論述、批判混茶,就不只是單純建構與再製混茶的負面形象,更是宣示他自身在確保安全、品質與農業本土的努力,宣示他自身在當代台灣茶產業中的位置,宣示他自身在全球農食體系與在地轉向之間的選擇。但是,在這種明確、一刀兩段的邊界運作之下,新的爭議浮現了:如果,茶產業從來都不是、也不可能徹底的純粹?

6.2 拼配與純粹

拼配,又稱併堆、拼堆。根據茶藝辭典的說明,拼配是一種將不同的茶葉原料依據特定比例混合,以追求更好、或更複雜風味的技術(許純鎰,2016; Kam Pong Chan, 2008)。如同我們在第五章提到的,茶葉風味的構成十分複雜,即便是同一茶廠前後數天的產品,也可能因為溫度、濕度和製茶過程而不同,更不用說是不同產地、莊園、年份、季節。隨著茶葉交易規模日益擴大,以一櫃九噸為交易單位的情境下,如何確保風味、品質與數量的穩定,就成了茶產業的核心考量。因此,拼配就成為全球各地茶產業追由穩定質與量的關鍵技術。

拼配同樣也深植於台灣茶產業之中。自十九世紀末茶葉引入台灣,並且形成原料出口的種植、製作、銷售與資金體系以來,類似當代拼配的工序,即廣泛地被運用在台灣茶產業中。當時的台灣茶產業以台北為加工、出口中心、在台灣西部的丘陵地帶迅速擴展種植面積,到了甲午戰爭之前,每年的出口量已經來到千



萬磅（林滿紅，1997：頁 20、58）。當時的製茶程序，是在產地進行粗製之後，就會透過中介的茶販流入茶棧、茶館、洋行等不同精緻、外銷業者手中，加工為烏龍茶或包種茶，輾轉透過廈門、香港等地，銷往美國、英國或東南亞。在茶販的手中，茶葉會進行第一次的合併與篩選，少部分劣次品、下茶流入內銷市場，其餘則會轉售予下游的精緻、外銷業者。到了出口階段，茶葉會依據品質被分級，根據 1896 年、日治之初的「台灣產業調查錄」所載，當時的洋行、茶商時將茶分為以下八個等級，是以片假名書寫的英文單字，例如價位最高的兩者分別是 *チョイセスト*（*choisest*，最精選）、*チョイスト*（*choised*，精選），其後還有 *シュペリオル*（*superior*，優異）、*グード*（*good*，好）、*コンモン*（*common*，普通）等（台灣總督府著、徐英祥譯，1896，頁 29）。我們無法斷言，當時是否所有茶葉都是在這套品質標準之下分類、銷售，因為調查報告中並沒有包括極少數最高級的茶葉；但是可以確信的是，茶葉的製程，大體而言就是一個不斷重複將不同來源的茶葉混合，而後依據品質分級的過程。如同資深茶人、現任製茶公會理事長解釋為何需要拼配，「一整年都有單，你能夠不拼嗎？春茶和夏茶的味道就不一樣，你能夠分開賣嗎？當然是要把年頭到年尾拼在一起，用同一個味道、品質來賣。」龐大而穩定的出口額，讓台灣茶產業必須拼配。

和百年前相比，台灣茶產業所行的拼配，除了技術上更為細膩，最大的差異只在於更複雜的產地來源：以越南台茶為主，來自中國、東南亞各地的原料。1980 年代，由於外銷市場競爭激烈，台灣茶產業開始著手開發內銷市場，從此逐漸由原料出口轉向「本土形象」濃厚的精緻內銷與飲料產業。同時，由於土地成本上升以及勞動力外移、老化，北部丘陵的原料茶產區逐漸走向減產、休耕。但是台灣茶產業對於低價原料茶的需求並沒有消失，甚至隨著本土化台灣茶產業的擴張而增加。填補原料茶需求缺口的，就是佔據土地、勞動力成本優勢的越南台茶。台灣茶產業的拼配從此更加複雜，從國內不同產地間的混合與分裝，走向跨國的混合與分裝。

長期應用於台灣茶產業的拼配技術，在當代因為牽涉到更大範圍、更大規模的空間轉移，逐漸被視為本土化台灣茶產業的威脅。而這個威脅，在於即便是最誠實的拼配，也會威脅到本土化台灣茶產業安全、精緻與本土這三個環環相扣的形象。在一則報導中，就呈現了將拼配與不誠實混用連結在一起的疑慮：

「茶改場凍頂工作站長黃正宗說，併堆是專業技術，將不同批的粗製茶混合，看似簡單，要提升品質或特色風味卻是大學問。混合過程可能將高價茶摻低價茶，農藥殘留就可能在品質、價位差別大的茶葉併堆時產生。魚池茶農說：「茶商進口越南茶轉售，過個水，茶飲店都說是向魚池買的，真擔心茶飲再驗出農藥，魚池紅茶也跟著遭殃。」」（黃宏璣等，2015/09/01）

這則報導中，一方面援引茶業改良場的官方、專業技術人員的說法，肯認拼配作為茶產業中的專業技術；另一方面也呈現了國內茶業經營者對拼配的不信任。所以，在疑雲重重的情況下，為何拼配的支持者仍然大有人在？拼配支持者口中的專業拼配，實際上究竟如何運作？專業拼配和不誠實的混用茶葉原料，有哪些區別？

何謂專業拼配？關於這個問題，許多拼配支持者，包括一些茶行業者、越南台茶經營者、以及茶葉研究者，心目中的答案都是全球知名的茶葉品牌「立頓」。陳老師，一位資深茶師、茶藝作家認為，像是立頓的專業拼配，和台灣人人喊打的「混茶」是不一樣的：

「亂配叫做混啦。比方立頓，立頓世界知名品牌，英國嘛，英國出茶嗎？對阿，英國沒出茶阿，阿英國就比方說中國買的，在越南買，在印尼買在印度買在各地地方買，阿他的茶師在買來以後，泡泡以後，各個地方的茶按照一定的比例把他配成一個配方，阿變成一個 at number。阿這個 at number 就是說每年都穩定，比方 a101，阿這個 at number，到每年你去買這個他品質都一樣，這就是他的 know how 阿……其實這就是說，要透過進來，拼配，台灣變成一個英國，像立頓，就

一個拼配中心，一個大公司願意去做這個事情。把拼配，建立一個品牌，然後品牌裡面又有一些產品，把他規格化，然後行銷到世界。」

在陳老師心目中，作為一門專業技術的拼配，和不誠實的混用茶葉原料，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兩件事情。陳老師對拼配的描述，大體和本節開頭引用的說法雷同，是為了特定的產量、成本與風味，將不同來源的茶葉原料，依據特定的比例混合。而拼配的支持者，也經常透過描述拼配的應用，提出一個立基於全球農食體系下的產業發展與農業政策想像。在這套說詞中，拼配以和進口茶的組合，可以讓台灣茶產業重新建立外銷體系，回到全球市場，獲取更豐厚的商機與利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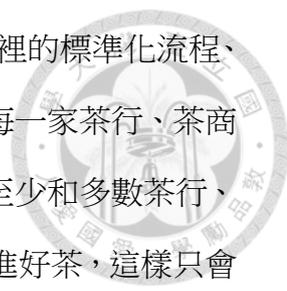
而在這套或許可以帶領台灣茶產業重返全球茶市的「立頓模式」之中，拼配又是如何具體運作？拼配的具體運作端看各廠家的規模、需求而有所不同。在一些大規模、甚至是跨國的企業，為了確保產品的口味、產量與成本的穩定，必須聘僱專業的品茶師，將來自不同產地、批次的茶葉，調配出所需的風味。如同一位越南台茶經營者對拼配的觀點，在這個大規模、跨國生產與交易的年代，「消費者能夠接受今天喝的麥香紅茶，和明天喝的味道不一樣嗎？」

另一種拼配的具體運作，則是由一些規模相對較小的茶行、茶商所操持，也就是本節前面提到，台灣茶產業百年來所流傳、應用的拼配技術。對茶行、茶商而言，即便交易規模不如立頓等跨國公司，但就算只是一個貨櫃九噸茶葉的生意，也必然是需要由許多不同產地、不同批次、不同風味的茶葉拼配而成。更不用說，某些特定的買家對茶葉有其偏好或特殊要求時，拼配就成了必然。亨哥，一位越南台茶第二代，曾經邀請我去參觀他和合夥人進行拼配的場景。2015年夏天，我和亨哥的父親接觸時，亨哥的父親並不看好越南台茶的前景，已經開始轉作花卉、蔬果。但是到了2017年夏天，許多先前還抱持一線希望的同行都灰心時，亨哥主動來聯絡我，邀請我去他們家的茶廠。原本我們約好在亨哥台中的公司進行訪談，但是到了前兩天，亨哥說「有一櫃茶正好進來要處理，要不要一起去看真正

厲害的？」什麼是「真正厲害的」？我先前已經因為一些專欄文章，而遭到一些關切、惡言相向。這時突然和一個素未謀面的受訪者，約在嘉南平原田中間的一個倉庫，實在令人心底難安。不過，一夜輾轉反側換來寶貴的田野資料，事後看起來還是無比划算。

亨哥所謂「真正厲害的」，就是讓他和他父親決定在一搏越南台茶的關鍵技術：拼配。如同第五章的分析，越南台茶並非不重視品質，而是在當地的勞動力編制與自然條件之下，追求品質的穩定。品質當然不可能每批都恆定如一，這時就需要拼配。真正掌握拼配的不是亨哥，而是亨哥的合夥人劉先生；亨哥也說，如果不是認識劉先生，不是劉先生說他們家的茶還有機會，亨哥也不會想接下越南台茶。因為亨哥和劉先生的要求，也為了保護受訪者的身份，我沒有留下任何影像紀錄，僅以當天的田野筆記呈現當天亨哥與劉先生的拼配工作：

今天的拼配工作從試茶開始。我們大約從十點開始喝茶，亨哥這次進來了 11 支茶，金萱、翠玉、四季春、烏龍都有，金萱最多，烏龍最少。在試茶的過程中，亨哥和劉先生就開始做第一次篩選，有一支金萱做的很好、有標準的牛奶糖香，不用拼就可以賣；比較多的情況是有一些小缺陷，稍微不夠香、不夠綠或茶湯不夠厚，這些比較好調整；還有一些問題比較嚴重，有菁味，下午要花點心思處理。午餐過後，劉先生就開始嘗試各種拼配的比例。亨哥說，劉先生的厲害之處，在於賣掉沒做好的茶。賣好茶人人都會，但是品質稍微不好的茶怎麼賣，就是真正厲害的地方了。劉先生一邊回想每一支茶的特色，一邊估算每一支茶的數量，推敲出各種比例——5：3：2、4：4：2——然後開始試茶。劉先生把品質較差的那幾支茶當底，當成 5 或 4 的部分，然後拼入其他香氣突出、或是茶湯翠綠的茶葉，端看「底」缺什麼，截長補短。經過劉先生的拼配，原本幾支沒做好、或是有小缺點的茶，又被拉回到一般的水準了。劉先生一邊拼配，亨哥也開始打電話聯絡買家，做的好的不用說，台灣茶市最緊湊的烏龍也沒問題，其他的茶就有技巧了，有點買家偏好綠一點的，有的買家偏好特定品種的風味。



拼配不是萬靈丹，亨哥和劉先生合夥之後，也同時開始建立茶廠裡的標準化流程、砸重本使用有機肥、豆肥，確保品質。我們也無法確定，是否每一家茶行、茶商都是如此進行拼配。但是亨哥和劉先生的拼配的目標與成果，至少和多數茶行、茶商拼配的目標與成果相去不遠。拼配當然不是單純把爛茶混進好茶，這樣只會浪費原本就品質出眾、可以輕易售出的茶葉，反倒減少獲利。關鍵在於，拼配者必須掌握手上每一支茶的特色，截長補短，確保每一支拿出去賣的茶葉都有點香、有點綠、有點厚、當然是不能有菁味的。換言之，拼配不只在於面向消費者，提供穩定的產量與品質，也在於中間盤商之間，整合手中茶葉，面向下游使用廠商或其他盤商，提供穩定的產量與品質。

拼配直到今日仍然被許多經營者視為台灣茶產業存續與擴張的關鍵技術。拼配和「不誠實的使用越南台茶」之間的曖昧不明，複雜化了「混茶」地討論。反對越南台茶的國內茶業經營者、部分國家行動者與學者將「不誠實的混用茶葉原料」視為大敵，透過論述混茶的負面形象或技術開發，打擊「混茶」，介入以本土為名的邊界化過程。以本土為名的邊界化過程，一方面確實打擊了蓄意的、不誠實的混用茶葉原料，一方面也挑戰了台灣茶產業的關鍵技術「拼配」。但實際上，拼配之於台灣茶行、茶商，卻是維繫生意、甚至走入國際茶市的關鍵技術。在此，毒茶、爛茶與混茶等諸多爭議合而為一，不只是台灣茶產業中的陣營劃分，更是直接反映了全球農食體系與在地轉向碰撞下，台灣茶產業本身暴露出來的問題。茶葉的安全與品質並非特定產地的本質，建立在這個本質化產地想像上的本土象徵不斷被跨國貿易與拼配挑戰。面對這個起因於拼配的本土象徵爭議，台灣茶產業相關的行動者們，又會如何回應、如何涉入邊界化過程？

6.3 空間與象徵性邊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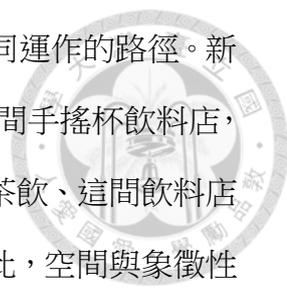
在本章的前兩節，我們依序討論了兩件事情，混茶負面形象的爭議，以及從這個爭議延伸出來，關於拼配與純粹的辯論。在釐清混茶的負面形象從何而來、

針對誰而來，以及混茶背後台灣茶產業與農業政策的爭議之後，我們要更進一步討論的是：混茶的負面形象，能夠引導我們如何重新思考邊界？尤其是，空間與象徵性邊界的關係？



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我們分別討論了食品安全與品質，如何在行動者們的運作下，成為空間與象徵性邊界本身。本文一再強調，空間與象徵性邊界必然密不可分，也是因為在兩者共構之下，才發生了表面上所見邊界封閉或開放的效果。不過，四五兩章的邊界運作，似乎都有其偏向：「毒茶」圍繞著農藥殘留標準與海關檢驗，偏向空間性邊界的運作；「爛茶」則圍繞著茶葉品質的界定，偏向象徵性邊界的運作。截至目前為止，空間與象徵性邊界似乎是各自獨立的兩套運行機制。不過，如同前一節所提出的論點，混茶的爭議其實是建立在毒茶與爛茶的爭議上；換言之，混茶提供了一個考察空間與象徵性邊界如何共構的具體案例。

2015 年飲料茶食安事件後的兩個政策調整，就說明了邊界運作必然是由空間與象徵性邊界共同組成。實際上，事件發生後台灣政府的亡羊補牢遠遠不止於此，但大多數都是階段性的全面抽查，而非持續性的政策。這兩項政策調整，分別是落實原產地標示，以及進口流向申報。落實原產地標示，即要求廠商必須在包裝上註明原產地。根據 2005 年財政部與經濟部的「大蒜等八項農產品之原產地認定基準」，茶葉屬於不論進口狀態、或是是否經過「實質」的加工，都應標註其收割、採集之國家或地區為原產地。不過，在 2015 年 7 月 31 日以前，手搖散裝茶飲幾乎都沒有標示茶葉原料來源，罐裝茶葉、瓶裝茶飲則多半標註最後乾燥、烘焙與包裝地——也就是，台灣。落實原產地標示的政策，是在無從封堵越南台茶進口的情況下，將選擇商品的責任轉嫁給消費者。從此，強行揭漏的空間性邊界標記連結上象徵性邊界的負面形象論述，邊界的運作被延伸到每個遭遇茶產品的消費場所，無所不在。落實原產地標示直接重挫越南台茶經營者。一間台灣大廠在如實標上原產地越南之後，銷量只剩原本的三成；由於下游越南台茶難以出售，給上游的訂單也大幅減少，林同省的各家茶廠都只能勒緊褲帶，或是轉



作另謀出路。落實原產地標示讓我們看見空間與象徵性邊界共同運作的路徑。新政策讓空間性邊界的劃分落實到每一罐茶葉、每一瓶茶飲、每一間手搖杯飲料店，隨時隨地地召喚出消費者心中的象徵性邊界：這罐茶葉、這瓶茶飲、這間飲料店用的是越南台茶，是否可能有安全、品質或混用上的疑慮？從此，空間與象徵性邊界在消費者面前連成一片，如何選購端看消費者的選擇、消費者心中的象徵性邊界如何劃定，而不再是國家行動者把關、封堵不力。

進口流向申報也發揮了類似的效果，連結空間與象徵性邊界，只是責任轉移的對象，從消費者改為茶葉原料使用者，也就是前一節提到，台灣茶產業中最需要拼配的部門。進口流向申報和落實原產地標示同時公告、上路，衛福部食藥署要求：

「業者應依衛生福利部 102 年 11 月 19 日發布之「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以紙本或電子方式，留存相關產品資訊、供應商資訊（進貨）、產品流向資訊（出貨）及內部追溯之紀錄資料。並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需於每月 10 日前申報上一個月的食品追溯追蹤資訊至食品追溯追蹤管理資訊系統（非追不可）。衛生福利部於 105 年 4 月 21 日公告修正「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與辦理檢驗之食品業者、最低檢驗週期及其他相關事項」，要求輸入茶葉業者自 106 年 7 月 31 日起，應就來源、製造、儲藏、銷售等各項重要管制環節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食藥署，2016）

衛福部食藥署的公告措辭拗口，但如果只看影響最大的部分，用阿姨的話就是「現在海關不只要驗農藥，還要申報我們要賣給誰！」。如此一來，政府就可以依據海關申報的資料，掌握越南台茶的流向。誠實的拼配，或是不誠實地混用茶葉，諸般混茶模糊了空間與象徵性邊界；而政府介入諸般混茶的第一步，就是進口流向申報。許多受訪者都推測，未來甚至可能要求業者，落實依據混裝含量標示所

有原產地²¹。

抽象來說，兩項政策就是讓空間與象徵性邊界相互援引，並且把排斥或接受越南台茶的責任轉移予更廣泛的行動者，更進一步日常化邊界運作。新的邊界運作情形，並沒有和第四、五章提到的邊界運作情形相衝突，而是促使越南台茶經營者們，繼續透過物質性與日常實做涉入邊界運作。新的邊界運作所帶來的調整過程中，許多越南台茶經營者試圖在物質性與每日實做上取得突破，但也有人從此退場。在第六章第二節提到過，亨哥和劉先生的合作不只在於透過拼配調整茶葉品質，而是從茶園、茶廠著手，確保安全與品質。當時試到其中一支有菁味的茶時，劉先生很篤定的告訴我們，

劉：「這一定是契作茶園那邊的問題。」

我：「為甚麼？大家不是都說，影響的因素很多嗎？」

劉：「我們現在都照 SOP 走，它跟其他支都不一樣，茶廠我們可以盯著，所以只會是差在茶園那邊。」

亨哥和劉先生試圖調整出最符合大規模原料生產的品質管理。亨哥和劉先生再次強調，越南台茶的重點不是追求某幾支特別出色的茶，而是要確保每一支都能達到一定的水準。因此，亨哥和劉先生選擇在茶園和茶廠落實一套標準化的作業流程，投入更多有機肥、豆肥增加養分，嚴格控制製茶流程的時間、溫度。如此一來，也許會因為沒有針對細微環境差異微調，而無法做出頂尖的茶葉，但至少能確保大多數的茶葉品質都相去不遠——反正，許多越南台茶經營者都堅信，無論越南台茶做得再好，也難逃被盤商壓價的命運；真的做出好茶，也是拿來送禮交朋友、或是小量但高價的賣給熟人比較划算。實際上，標準化作業流程並不是只有亨哥和劉先生想到，調整過程中增加的成本和不確定性，讓許多經營者猶豫再三。亨哥的茶廠的調整，是要更貼近大規模原料生產的越南台茶的物質性與每日

²¹ 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位不願透漏身分的受訪者表示，既然只有輸入業者要申報，「現在也只能再找一個在台灣有茶的人轉手，只是又要被剝一層了」。如此一來，越南台茶入境之後，會被轉手「洗」掉流向記錄，再賣給真正的買家。

實做，確保在原產地標示與流向申報的嚴苛邊界運作下，仍然能夠穿越空間與象徵性邊界。

但是在原產地標示與流向申報的嚴苛邊界運作下，也有人選擇就此退場。原產地標示讓越南台茶在台灣銷量銳減，連帶導致盤商減少下單越南台茶；流向申報儘管沒有直接打擊越南台茶，但卻讓越南台茶成本上升（見註腳 21）。2015 年，我曾經訪問過一位替所屬集團打點茶廠的安經理，當時他和我們討論成立林同省茶業產銷班的可能性，信心十足——至少表面上如此。但是隔年的移地研究，就聽說安經理所屬的集團，將茶地、茶廠賣給越南人，去巴西種咖啡了。2015 年也和我們一起討論產銷班的阿元，隔年消沉不少，

元：「去年大家就意識到可能會有一波洗牌，現在安晶先走了，過幾年我看喔……會更厲害！」

我：「阿元大哥的意思是，變成越南人在做，就像安晶那樣？」

元：「我看很有可能！……主要還是這個原產地標示。」

在我進行移地研究的 2015 到 2017 年間，就有至少兩家越南台茶經營者將茶園、茶廠賣掉，其他人也紛紛休耕、部分轉作、甚至荒廢茶地。某間茶品公司在將越南印上包裝之後，銷量銳減到原本的三成；銷售端斷流，盤商、茶行也隨之減少對越南台茶的訂單，最上游的越南台茶經營者因此損失慘重。余老闆 2004 年從母親手中接過花卉事業，在農場門口的空地上種下第一批茶苗，逐漸轉型為茶農。2017 年，余老闆親手荒廢了農場門口的茶地——余老闆說是修剪茶樹，讓茶地休息、恢復地力，但散落的垃圾和肥料袋，讓人不知道這片茶地什麼時候才能恢復生產。

新的邊界運作已影響了林同省茶產業中的越南人。在我剛進入田野的 2015 年，從事茶產業的林同省越南人原本就已經處在多事之秋：當地規模最大的越資茶廠老闆在中國被謀殺。這起命案讓越南茶農群龍無首，只能載著一袋袋的茶菁到台資茶廠求售；但隨後台灣人也陷入困境，整個林同省茶產業幾乎停擺。由於

台、越經營者不約而同地減產，越南人經營的茶苗育苗場當然也生意冷清；2016年的暑假，阿姨三天兩頭接到育苗場的電話，希望阿姨能先把茶苗拿走、賒帳到明年都沒關係。幾天之後，我們開車路過育苗場，發現育苗場主如此急切的原因：他的茶苗都快長成茶樹了，卻還插在育苗場裡無人問津。

小結

在第六章，我們試圖透過混茶的爭議，探討全球農食體系與在地轉向碰撞下的農業本土劃界。混茶的負面形象，同時指涉了兩個本土化台茶視為威脅的對象：不誠實的混用茶葉原料，以及在台灣茶產業傳承百餘年的拼配技術；前者是以越南台茶冒充國內茶，後者則是依據特定的比例混合茶葉原料，在特定的數量與成本下，調製出所需的風味。越南台茶透過這兩種模式進入台灣茶產業，挑戰了本土化台茶的空間與象徵邊界，安全、品質與本土象徵的劃界，無法繼續有效界定何謂本土台茶的判準，形成農業本土的危機。然而，也正是透過混茶穿越邊界而來的越南台茶，支撐了產量不足的本土化台茶；換言之，從混茶的案例而言，拼配與純粹、移動與劃界，全球農食體系與在地轉向，是一組互相依存的關係。

為了解決農業本土的危機，越南台茶的反對者在 2015 年飲料茶農藥殘留超標事件之後，試圖藉由新的邊界化過程，封閉邊界，排除越南台茶。新的邊界運作方式，就是原產地標示和進口流向申報兩項政策。兩項政策透過將責任轉移到消費者與茶業原料使用業者，由此緊密連結空間與象徵性邊界，並且延伸到每個可能遭遇越南台茶之處，是貫穿整個社會，發生於日常生活中的邊界化過程（Reece Jones, 2009a；Corey Johnson & Reece Jones, 2014）。

面對新的邊界化過程，越南台茶經營者們或選擇留下，或就此退場，兩種選擇都是邊界運作的具體展現。選擇留下的經營者，繼續調整茶園、茶廠的物質性與每日實做，做出可以穿越空間與象徵性邊界的越南台茶。而退場者的選擇，也體現了邊界運作的張力，如何具體作用在越南台茶的經營實踐上。從邊界化過程

的角度，儘管越南台茶，以及越南台茶經營者們，身在遠離傳統邊界的林同省高原上，但是透過日常化的邊界運作，他們都是身在日常化的邊界上的人。



第七章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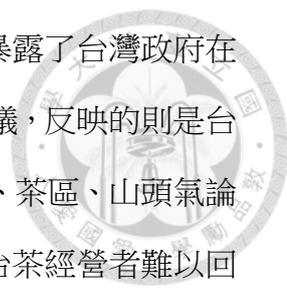


回到 2015 年七月，胡志明市安東市場旁的那間旅館，我癱倒在床上的思緒中。起初，我遵照任何一本質性研究教科書的指示，試圖從整理「他們」的觀點開始。在越南台茶的爭議中，「他們」最揪心的是甚麼問題？受訪者們最揪心的顯然是在於越南茶這個被貶抑、被劃除在台灣之外身分；以及，可以如何費盡心機，穿越有形無形的邊界，取得台灣茶的身分。但這些整理沒有幫助我釐清思緒，直到我轉而思考，「我」自己最揪心的又是甚麼問題？在這個據稱已經沒有族群問題的台灣，界定抽象或具體「台灣的範圍」的過程從來沒有停止。界定自身的工程，在面對台灣與東南亞之間越界的人與物時格外充滿張力。邊界的穿越與封阻，正是越南台茶負面形象背後的關鍵驅力。於是，我立刻起床，將「邊界」一詞寫進我的筆記本。邊界一詞，指引我連結越南台茶的現象與真心的研究動機，進行對諸多形式的邊界運作過程的考察。

Why border ?

邊界，包含穿越邊界的嘗試與移動，以及不同形式的邊界共構出的邊界運作，是越南台茶負面形象背後的關鍵驅力。透過邊界的觀點，本文要強調越南台茶如何透過物質性的移動與調適，扎根於越南的同時，也越界歸來為本土化台茶的一部份。1980 年代以來，台灣對東南亞各國的投資不斷增長，台商藉由台灣與東南亞的產業與族群網絡，透過在地的資本生產調適，建構台灣的跨國資本；越界南向，不只在於抽象的「理性經濟人」，更是實踐出來的「社會經濟人」（龔宜君，2005：2）。

越界得以可能，不會僅止於社會關係的連結與移動，生長環境，茶葉品種的抗蟲害能力，不同的發酵程度，乃至身體感官層次的水色、香氣與茶湯，都是越南台茶必須考量的物質性實做。工於旨在越界的物質性實做，越南台茶才可能穿越邊界，在盤商手中隱晦的改換身分，成為本土化台灣茶產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甚至參與何謂台茶本土的協商過程。農藥殘留的爭議始終困擾著台灣茶產業，隨



著越南台茶經營者逐漸掌握農藥管理之道，毒茶的爭議，反而暴露了台灣政府在茶產業產品端檢驗難以落實的弊病。爛茶負面形象所衍伸的爭議，反映的則是台灣烏龍茶模糊不清的品質排序體系，本質化風土的產地、海拔、茶區、山頭氣論述，或是強調農園管理、製茶過程、拼配的技術論，不只越南台茶經營者難以回答「何謂好茶」的問句，即便是台灣最資深的茶農、茶商、茶藝師，在這一題也是各執一詞。混茶負面形象的爭議，呈現了經營者們對於台灣茶產業發展路線的不同想法，並且延伸為農業政策層次的辯論，辯論的是台灣茶產業在全球農食體系與在地取向之間的選擇。越南台茶的負面形象起因於越界的空間移動過程，而這些負面形象，表面上是議論越南台茶的毒、爛或混，實際上反映的卻是台灣茶產業本土化轉型以來，諸多遮掩在在地旗幟之後，無法自圓其說的弊病。台茶本土化催生了對越南進口茶的需求，越南進口茶又促動了更進一步的本土化劃界，而本土化劃界最終提供了重新理解本土化台茶的窗口。

How border ?

本文承襲晚近邊界研究對日常生活的關注，透過非國家行動者遠離傳統邊界的劃／跨界行動，重新理解本土化轉型後的台灣茶產業，乃至於全球農食體系與在地取向碰撞下的台灣農業政策。如同 Robert Feagan (2007: 37, 39) 對於晚近諸多「在地食物系統」(local food system) 倡議與實踐的提醒，所謂的「local」，無論譯作本土或是在地²²，其邊界必然是人類建構的產物，必須警惕邊界建構轉變為排外、純化的可能性。Reece Jones (2009a) 提出以分類理解邊界的觀點，讓地理學的邊界研究進入空間性或象徵性的辯論。空間性邊界的觀點關注在邊界地勢的物質性，強調邊界運作無法脫離邊界地帶而視之；象徵性邊界的觀點則透過日常生活中的邊界運作，將邊界理解為更廣大範圍的社會過程。

²² 本文認為，在台灣農業議題的語境中，此處的「local」指涉了「在地」與「本土」兩個詞彙的重疊之處。在本文台灣茶產業的案例中，1980年代台灣茶產業著手開發內銷市場以來，以台灣為尺度的本土，以及以各茶區為尺度的在地，始終都是相互牽引演進的雙股螺旋。「台灣茶」一方面被建構為健康、精緻的本土技術象徵，一方面也同時被視為諸多山頭茶區的形象與產業支柱。

但是，如同本文的分析，空間或象徵性邊界並非相互排斥的兩種研究取徑。邊界要發揮選擇性開放或封閉的效果，需要空間與象徵性邊界的相互援引。在越南台茶的案例中，貫穿諸般負面形象，牽連兩者相互援引的，就是物質性與每日實做。同時，越南台茶負面形象的爭議，也呈現了跨界與劃界如何作為邊界運作缺一不可的一體兩面，並且促使我們思考空間與象徵性邊界共構的運作方式。在日常生活邊界的討論中，象徵性邊界的概念意義與重要性已經成為研究者們關注的核心；而本文則試圖透過對物質性的討論，重建空間與象徵性邊界概念與現象上的連結，探究兩者如何相互援引、相互作用。在越南台茶的反對者口中，台灣烏龍茶的物質性具備根著於特定風土、難以穿越邊界的特徵。但是越南台茶經營者而言，正是透過對台灣烏龍茶的物質性的關注，以及面對經營模式與勞動力體系調整出的每日實做，讓越南台茶得以穿越根著於特定風土的規範與想像，進入台灣與台灣的茶葉供需體系。最近開始應用於辨別茶葉原產地的 DNA 分析技術，更是在物質性一途走到極端，將茶葉的有機化學組成建構為物質性做為本土農業保護論述的基礎，援引為空間性邊界劃分的依據，由此召喚象徵性邊界的負面形象進行劃界——無論它的物質性基礎，和最終的象徵性論述下的安全或品質是否有任何可證的關係。物質性構成了所謂的台灣茶產業獨特性與本土象徵，疊合了空間與象徵性邊界，共同運作出穿越或排除的效果。

2016 年六月底的某天下午，阿伯、阿姨開車帶我去拜訪林河的阿華老闆。阿華老闆是越南華人，1980 年代時跟著吳活明和他請來的台灣師傅學做茶，之後自立門戶。我們一下車，發現茶廠正對著一片波光粼粼的小湖，風和日麗，連忙拿起相機、手機拍照（圖 17）。後來訪談到一半，阿伯突然跳了起來，指著湖對面大叫，

阿伯：阿華，他林河那邊好像都是草欸？

阿華：對阿！死光啦，死七成欸！死到很可怕欸！

阿伯：怎麼…

阿華：現在看到綠綠的那個是草啊！

阿姨：草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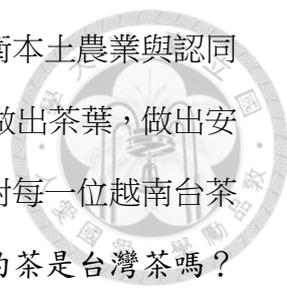
阿華：裕民講不要放肥料，盡量偷，結果水不澆，死到跟農藥中毒一樣。那邊（咖啡園）是農民的，以前是我們老闆（阿伯、阿姨）在那邊看茶園…

這個訪談雖然不長，但卻是三年移地研究中，情感最豐富的一刻。林河附近不只是號稱越南台茶發展最好、環境最適宜、價錢最高的地方，更是 20 多年前，首次轉移台灣烏龍茶品種的試驗田所在——就是圖 17 中，湖對面檳榔樹下那片低矮的廠房與茶園。這塊最早的試驗田，就是 20 多年前阿伯和阿姨剛來越南時的第一份工作。從這裡開始，越南台茶從一塊試驗田，發展到巔峰時期的 20 多間台資茶廠；從林河的一個小湖邊，散佈到 20 號公路沿線三四個小時車程的範圍。在老公司拆夥的時候，林河的茶廠被別的股東抽走，阿伯和阿姨從此離開這裡；沒想到再次遠眺，只見一片漫過茶樹的野草。林河的茶廠，曾經是穿越邊界的起點，體現圍繞著茶葉物質性的實做，以及這些實做如何可能穿越邊界。二十多年後的同一間茶廠，體現了另一種形式的物質性邊界運作，它是劃立、封閉的邊界的地景。



圖 17 越南最早的台灣烏龍茶種試驗田。具體位置是在右側白牆紅屋頂房子以左，坡頂上的整片茶廠、茶園——如今皆已荒蕪。（作者攝影）

邊界的運作，穿越或封閉，最終必然都攸關自身界定的工程，攸關「我是誰」



的大哉問。在台灣茶農、茶商援引物質性來反對越南台茶、捍衛本土農業與認同象徵的同時，越南台茶經營者同樣每日每夜的與物質性為伍，做出茶葉，做出安身立命的家業，在物質性的實做中，做出複雜糾結的認同。面對每一位越南台茶經營者，我都在訪談的最後問了同一個問題：「老闆，你覺得你的茶是台灣茶嗎？你覺得怎麼樣才算台灣茶？」答案總是如同經營者們的認同一般複雜糾結。他們一方面理所當然的認定，用的是台灣品種、台灣的技術、做出來也和台灣茶差不多，甚至半開玩笑道「拿的是台灣護照」，如何不是台灣茶？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會陷入產地、空間為依據的劃分與想像裡面，恐怕自己的宣稱會混淆了「台灣茶」這塊金字招牌、這個難以割捨的認同。他們的答案，在反覆推敲之後，出奇地一致，就是越南台茶。「越南」意謂著他們穿越空間邊界而去的移動，以及認同上的掙扎；「台茶」則透露了他們穿越象徵邊界而回的標準，以及大半生對著茶樹茶葉的努力。越南台茶不只是拗口的研究對象，更是他們給自己的茶安上的名字，更是他們給自己同樣拗口、在台越之間穿梭來去的認同所安上的名字。

參考文獻

一、 中文文獻

(作者不詳) (2015/04/23)。手搖飲料店多用越南茶 「碎形紅茶」一杯成本僅 2 元。ETtoday 新聞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50423/497098.htm>。(2018/01/30 瀏覽)

(作者不詳) (2015/04/24)。進口大宗「越南茶葉」問題多 徐鈺煌：食藥署早知道。ETtoday 新聞雲。<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50424/497325.htm> (2018/01/30 瀏覽)

2017 南投世界茶葉博覽會。取自 <http://teaexpo.mmweb.tw/?ptype=info> (2017/12/19 瀏覽)

丁萬鳴 (1999/06/10)。進口茶葉 將檢測農藥殘留。聯合報，03 版。

王淑瑛 (1995/04/29)。農委會反對進口大陸茶。民生報，18 版。

台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 (2017)。106 年台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會員大會會議手冊。

台灣總督府著，徐英祥譯 (2011)。台灣茶葉調查報告譯集。台北：台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

江良誠、盧禮賓、黃福其 (2009/11/17)。劃清界限 名聞茶農喊冤。聯合報，A6 版。

江昺崙 (2016/04/19)。鬼王對決白米炸彈客：台灣農業辯論。端傳媒。

行政院財政部關務署 (日期不詳)。進、出口貨物數量、價值查詢。<https://portal.sw.nat.gov.tw/APGA/GA03> (2018/01/30 瀏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2004)。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4—茶樹保護。台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余舜德 (2013)。台灣凍頂烏龍茶之工匠技藝，科技與現代性。臺灣人類學刊，11 (1)：123-153。

吳淑娟 (2007)。戰後台灣茶葉的發展與變遷。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吳聲舜，2012。台灣新興特色茶—紅烏龍介紹。(農政與農情)，235：
<https://www.coa.gov.tw/ws.php?id=2444926> (2018/02/11 瀏覽)

周孟嫻 (2014)。善用多元策略 再現台茶風華—我國茶葉加值策略分析。臺灣經濟研究月刊，37 (3)，34-41。

- 東森新聞 CH51 (2014)。台灣茶混越南茶賣 橙劑污染源恐喝下肚。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bIo0DUyEqc> (2018/02/11 瀏覽)
- 林鼎盛 (2007)。新式台灣茶飲的社會學分析。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滿紅 (1997)。茶、糖、樟腦與台灣之社會經濟變遷 (1860- 1895)。台北：聯經。
- 邱念渠 (2005)。台灣茶葉產業的演進過程與發展困境。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學位論文。
- 南投縣政府主計處 (2016)。104 年南投縣統計年報。
- 施靜茹 (2007/07/28)。11 噸越南綠茶 也驗出含農藥。聯合報，A6 版。
- 凍頂工作站、李嘉雯、黃玉如、黃正宗 (2015)。從農藥殘留檢驗談茶葉安全。茶葉專訊 93：9-10。
- 茶葉改良場。品種特性簡介。取自 <http://www.tres.gov.tw/view.php?catid=1668> (2017/09/21)
- 高堂堯 (2016/06/04)。周刊爆混茶「洗茶」 鹿谷凍頂合作社嗆告。蘋果日報。
- 張明仁 (2008)。讓偽造台灣茶無所遁形 從境外茶進口談原產地包裝標示問題。臺灣經濟研究月刊，31 (3)：120-124。
- 張柏福 (2005/07/10)。7 成高山茶 疑摻低價茶。聯合報，A6 版。
- 張家樂、陳紹聖 (2007/04/12)。進口衝擊 上千茶農決北上陳情。聯合報，C1 版。
- 張家樂、黑中亮、張宏業 (2017/06/14)。越南茶冒凍頂參賽 得獎價暴漲。聯合新聞網。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7320/2522729> (2018/01/30 瀏覽)
- 張海琳 (1996/03/01)。越南茶將採階段性限量進口。經濟日報，15 版。
- 莊芳銘 (2007/04/20)。抵制混血茶 茶農北上請願。聯合報，C2 版。
- 許純鎰 (2016)。從異域到茶鄉：泰北邊境的茶產業與地方浮現。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 陳宇翔 (2007)。從烏龍茶到高山茶：台灣茶壟斷租的社會建構。臺灣社會學刊，(39)，107-157。

- 
- 陳紹聖、簡獻宗（2000/12/05）。越南茶跨海參賽 反銷台灣。聯合報，18 版。
- 陳惠惠、朱淑娟（2007/11/26）。半年 3 次 越南茶又驗出毒。聯合報，A8 版。
- 程嘉文、祁玲（2007/07/27）。市售未見越南茶？ 都拿去混了。聯合報，A8 版。
- 程遠述、陳秋雲、陳皓嫻、黃宏璣（2015/04/23）。英國藍農藥茶…多項來自越南。聯合報，A3 版。
- 黃月英（2011）。台灣茶產葉產銷現況分析級政府因應政策：以 WTO 及 ECFA 為例。國立中央大學政治學系學位論文。
- 黃宏璣、紀文禮、張家樂、賴香珊、陳妍霖、蔡孟好，2015/09/01。消失的進口茶 混進茶廠「併堆」？聯合報。
- 歐于德、陳文雄、劉鋼（2011）。台灣實施產地國標示之經濟效益—以估計牡蠣及茶葉願付價格為例。應用經濟論叢，90：137-181。
-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2014）原產地標示 Q&A。取自 <https://www.fda.gov.tw/upload/133/Content/2014040711512826781.pdf>（2017/11/30 瀏覽）
- （2015a）。茶飲事件中央暨地方聯合採取積極措施，保障消費者飲用安全。取自 <https://www.fda.gov.tw/TC/news.aspx?cid=4>（2017/11/10 瀏覽）
- （2015b）。食藥署公布目前各縣市最新抽驗進度（8）。取自 <https://www.fda.gov.tw/TC/news.aspx?cid=4>（2017/11/10 瀏覽）
- （2015c）。逐櫃逐批查驗。取自 <https://www.fda.gov.tw/TC/news.aspx?cid=4>（2017/11/10 瀏覽）
- （2016）。輸入茶葉邊境查驗結果。<https://www.mohw.gov.tw/mp-1.html>（2017/11/10 瀏覽）
- 鞏宜君（2005）。出路：台商在東南亞的社會形構。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 魯永明（2015/08/01）。食品標示新制上路 衛局查 36 店。聯合報，B3 版。
- 謝恩得、陳紹聖（2008/02/24）。假紅假綠 喝起來口感硬。聯合晚報，A4 版
- 蘇怡如（2011）。飲料茶產業與名聞鄉茶葉產銷體系的變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學位論文。

二、 英文文獻

- Agnew, J. (1998). *Geopolitics: 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 Bauder, H. (2011). Toward a critical geography of the border: Engaging the dialectic of practice and meaning.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01 (5), 1126-1139.
- Boyce, G. A. (2016). The rugged border: Surveillance, policing and the dynamic materiality of the US/Mexico frontier.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4 (2), 245-262.
- Chan, K. (2008). *A glossary of Chinese Puerh tea*. Taipei, Wushing
- Chern, W. S., Hong, J. P., & Liu, K. E. (2013). Comparison of the Vickrey Second-Price and Random nth-Price Auctions for Analyzing Country of Origin Labeling in Taiwan. *Academia Economic Papers*, 41, 215-254.
- Déry, S. (2000). Agricultural colonisation in Lam Dong province, Vietnam. *Asia Pacific Viewpoint*, 41 (1), 35-49.
- Dodds, K. J. (2014). *Global geopolitic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 Elden S (2013). *The Birth of Terri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alt, R. E. (2008). Pesticides in export and domestic agriculture: Reconsidering market orientation and pesticide use in Costa Rica. *Geoforum*, 39(3), 1378-1392.
- Ha, T. M. (2014). Establishing a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framework for promoting organic farming in Northern Vietnam: a case study on organic tea production in Thai Nguyen province. *Asian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2 (03), 202-11.
- Johnson, C., & R. Jones, (2014). Where is the border? in *Placing the border in everyday life*, Jones R., & C. Johnson, 1-11. Surrey: Ashgate.
- Johnson, C., R. Jones, A. Paasi, L. Amoore, A. Mountz, M. Salter, & C. Rumford (2011). Interventions on rethinking 'the border' in border studies. *Political Geography*, 30(2), 61-69.
- Jones, R. (2009a). Categories, borders and boundar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3 (2), 174-189.
- (2009b). Agents of exception: border security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Muslims in Indi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7 (5), 879-897.

- (2009c). Geopolitical boundary narratives,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 and border fencing in India.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4 (3), 290-304.
- (2014). Borders wars: Narratives and images of the US—Mexico border on TV. in *Placing the border in everyday life*, Jones R., & C. Johnson, 251-255. Surrey: Ashgate.
- Joseph, Y. & R. Rothfuss (2014). Symbolic bordering and the securitization of identity markers in Nigeria's ethno-religiously segregated city of Jos. in *Placing the border in everyday life*, Jones R., & C. Johnson, 251-255. Surrey: Ashgate.
- Korteweg, A., & G. Yurdakul (2009). Islam, gender, and immigrant integration: Boundary drawing in discourses on honour killing in the Netherlands and German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2 (2), 218-238.
- Lamont, M., & Molnár, V. (2002). The study of boundar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 167-195.
-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2016).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Taiwan: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 Newman, D. (2006). Boundaries. in *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Agnew, J. A., K. Mitchell, & G. Toal. 123-137. Oxford: Blackwell.
- Ngoc, D. V. (2012). Breeding of tea plant (*Camellia sinensis*) in Vietnam. In *Global Tea Breeding*.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 Paasi, A. (2009). Bounded spaces in a 'borderless world': border studies, power and the anatomy of territory. *Journal of Power*, 2 (2), 213-234.
- Phuoc, D., P. Hong, D. T. Ha, N. N. Thuy, L. Van Du, P. T. Hung, M. V. O. Espaldon, and A. O. Magsino. (2006). *Impacts of Changes in Policy and Market Conditions on Land Use, Land Management and Livelihood Among Farmers in Central Highlands of Vietnam*. presented at Sustaining Upland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Issues, Tools, and Institutions for Local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Conference, ACCEED, Makati City, Philippines, May.
- Saigenji, Y., & M. Zeller (2009). *Effect of contract farming on productivity and income of small holders: The case of tea production in north-western Vietnam*. In Contributed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Conference, Beijing, China (pp. 16-22).
- Sohoni, D., & J. B. Mendez (2014). Defining immigrant newcomers in new

destinations: Symbolic boundaries in Williamsburg, Virgini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7 (3), 496-516.

Sur, M. 2013. Through Metal Fences: Material Mobi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ity at Borders. *Mobility* 8(1): 70-89.

